

摘 要

政教关系问题自古以来就是世界各国一直所关注的、较为敏感的问题之一。因为政教关系处理的成功与否，不仅关系到国家内部的稳定与统一，同时也可能涉及到国际关系。当然俄罗斯国家也不例外，东正教自传入俄罗斯国家，就深刻影响这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

本文试图把国家政权和东正教会放到斯大林时期不同历史阶段中进行系统分析考察，即从战前斯大林政府实行打击、镇压的宗教政策，致使东正教会面临灭亡的命运，到卫国战争中政教关系转入了正常化时期以及战后苏联当局继续坚持战时的宗教政策这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

分析在不同时期的重大事件中东正教会与国家政权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归纳出东正教会和国家政权的关系特点及其演变的规律性。这种政教关系的变化都是以国家利益为前提，同时，斯大林政府一直掌握着发展变化的主动权，东正教会只是一直被动的接受苏联当局的宗教政策，自身不断的调整以适应环境的变化，以维持发展。

关键词：斯大林；东正教；东正教会；政教关系；影响

Abstract

The problem of the state and the church is a great concern and sensitive issue of all the countries in our world, because whether it can be solved successfully has a great effect on the internal stabilization of the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ake Russia for example, brought into the state, the Orthodox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is county.

This article try to researc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rthodoxy church and the state political power of the Soviet Union during Stalin administration by putting it in the different period of Soviet's history, It is analyzing from three historical phases : Stalin government pratised the religion policy of stricking and suppressing before war,which brought about the Orthodoxy Church being faced with ruined fate ,in the days of defending country wa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church changed over normalization ,and afterwar Soviet Union government still maintained wartime religionistic policies.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church in different period in Soviet Union,and to draw out the characters and regularities and get conclusion that all the changes between them is decided by the national interests,at the same time,Stalins government had the initiative at all times,while the Orthodoxy Church constantly adjusted itself in order to adapt itself the religionistic policies of Soviet Union government.

Key words: Orthodoxy; the Orthodoxy Church; Stalin administr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church; influence;

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据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东北师范大学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而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荆喜双 日期：2006.06.10

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东北师范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东北师范大学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学位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东北师范大学可以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它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

(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荆喜双 指导教师签名：荆喜双
日 期：2006.06.10 日 期：06.6.11

学位论文作者毕业后去向：

工作单位：_____

电话：_____

通讯地址：_____

邮编：_____

引 言

政教关系是自宗教产生以来人类面临的一个普遍性问题。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政教关系扑朔迷离，充满了戏剧性的变化。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不存在政教关系问题，政教关系不仅直接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密切相关，而且影响到经济、文化、外交等诸多方面，俄罗斯也不例外。从东正教传入俄罗斯开始，东正教就深刻地影响着俄罗斯国家、俄罗斯民族、俄罗斯文化和俄罗斯的民族精神。东正教不仅使俄罗斯民族保持着统一思想，拥有强大的民族意识，而且对于俄罗斯国家的形成也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苏联时期是东正教传入俄罗斯后经历的最艰难、最特殊的时代，但是东正教在这段历史所起的作用也是不能忽略的。特别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东正教的传播对于保卫国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剖析俄罗斯不同历史时期政教关系的特点，描绘政教关系变化的轨迹，不仅是解读俄罗斯历史的一把钥匙，并有助于正确认识东正教在当今俄罗斯社会中所起的作用，而且可以作为研究东、西欧国家的政教关系的参照系。

20世纪以来，苏联（俄国）、波兰以及欧美一些国家都有学者研究俄罗斯政教关系问题，其中以苏联（俄国）学者居多。

俄国学者赫克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撰写的《俄国革命前后的宗教》^①分上下篇，从整体上概述了俄国东正教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关系的历史。目的是向欧美学界介绍俄国东正教的历史和现状。赫克以一位社会学家的身份论述了俄国东正教的历史及其宗教特点，没有采取维护东正教的立场，而是致力分析俄国东正教传统与俄国向现代转型的关系，重点在于东正教的现代变迁。虽然苏维埃制度及其宗教已成为过去的陈迹，但对如今研究政教关系仍然不失其学术价值。前苏联的著名学者尼·米·尼科利斯基著的《俄国教会史》^②以评论的形式比较全面系统的叙写了俄罗斯东正教会、旧礼仪派和教派分化运动历史，本书资料丰富，是用马列主义观点写成的宣传无神论的一本好书，也是我们了解俄罗斯东正教会历史的一本很有价值的参考书；但本书由于是在半个世纪之前写成的，不可避免地会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1974年Эрин Г.И.（艾林·格·伊）的著作《国家和宗教》（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Религия）出版了^③，书里主要论述国家政权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国内宗教所采取的不同政策，及宗教在国家政策下不断的调整，寻找适应发展的机遇。这样就形成了复杂的政教关系，也给历史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由于受意识形态的限制，当时的材料也不是很丰富，所以这些专著难免存在一些缺憾。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欧的巨变、苏联的解体，冷战的结束，迎来了苏联档案材料解密的契机，新材料为俄罗斯政教关系问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1998年俄国学者阿罗夫·阿·阿（Алов А.А.），弗拉彼米洛甫·恩·格（Влабимиров Н.Г.），奥

^①[俄]赫克：《俄国革命前后的宗教》，高骅、杨缤译，上海：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

^②[苏]尼·米·尼科利斯基：《俄国教会史》，丁士超、苑一博、杜立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

^③Эрин Г.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Религия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РИОР, 1974.

夫孙卡·弗·格 (Овсинко Ф.Г.) 合著的《世界宗教》(Мировые Религия)^①一书出版, 这本著作主要论述了俄罗斯历史上有代表性的宗教和教会的发展史, 其中包括基督教(东正教、天主教、新教及亚美尼亚的宗教的教会)、伊斯兰教、佛教及犹太教的历史, 有关东正教的篇章主要记述了从古罗斯时期直到现今俄罗斯社会1000多年的历史。1998年巴斯别洛甫斯基·德·夫(Поспеловский Д.В.)的著作《东正教在古罗斯、俄罗斯和苏联的历史》(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Истории РУСИ РОССИИ И СССР)^②也出版了, 他在著作中主要论述了东正教与俄罗斯不同时期国家政权之间的嬗变关系及东正教在俄罗斯历史中的重要性。这些著作对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可靠的资料, 然而, 目前尚无有关斯大林时期苏联政教关系的专著出版。

除此之外, 苏联有一本刊物即《历史问题》(《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я》)经常刊出解密的档案资料。笔者在这杂志中找到许多相关的资料: 1990年3月刊登的文章《东正教在俄罗斯历史的作用》(Роль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в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③, 记载了1989年11月15日莫斯科大主教和莫斯科宗教科学院在莫斯科进行了关于俄罗斯东正教会在俄罗斯历史作用中的交流; 1999年4月刊登了巴斯别洛甫斯基·德·夫(Поспеловский Д.В.)的文章《二十世纪的东正教会》(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XX веке)^④, 这里主要讲述了卫国战争时期被法西斯占领区域的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情况及法西斯在这段期间的活动给当时的苏联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1994年4月刊登的《1927—1943年的俄罗斯东正教》(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1927—1943 годах)^⑤, 讲述二战前苏联政权对东正教和教会实行残酷的镇压, 教会神职人员受到迫害, 教堂也不断随之关闭, 致使东正教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悲惨命运; 1995年8月刊登的《1943—1957年的俄罗斯东正教》(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1943—1957 годах)^⑥讲述的是卫国战争期间, 东正教会用行动支援政府, 并且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抵抗法西斯, 于是斯大林政府迫于国内外的环境, 及时调整了对东正教的政策, 因而使东正教会出现了短暂的发展机遇; 2002年10月刊登的史科夫洛甫斯基·米·夫(Шкфровский М.В.)的文章《斯大林时期和赫鲁晓夫时期的东正教会的情况》—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при Сталине и Хрущев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 — церков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СССР в 1939 — 1964 годах) .М.Крутицкое Патриаршее Подворье общество любителей церковной истории 1999 .400с^⑦, 这里讲述了二战期间由于斯大林调整了宗教政策, 致使政教关系走向正常化, 东正教随之出现了复苏的景象, 这种宽松的政策直到赫鲁晓夫后期才结束。以上的作者都只是注重对斯大林统治时期某一个阶段的叙述。

国内学者以研究俄国史和东正教史者居多, 专门研究俄罗斯政教关系者较少, 这也

^① Алов А.А., Владимирцов Н.Г., Овсинко Ф.Г., Мировые Религия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РИОР, 1998.

^② Поспеловский Д.В.,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Истории РУСИ РОССИИ И СССР.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РИОР, 1996.

^③ «Круглый стол» Роль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в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я, 1990№3.С.84—106.

^④ Поспеловский Д.В.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XX веке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я, 1999№4. С.161—163.

^⑤ Васильева О.Ю.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1927—1943 годах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я, 1994№4.С.35—46.

^⑥ Шкфровский М.В.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1943—1957 годах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я, 1995№8.С.6—56.

^⑦ Шкфровский М.В.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при Сталине и Хрущев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 — церков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СССР в 1939—1964 годах) .М.Крутицкое Патриаршее Подворье общество любителей церковной истории 1999 .400с.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я, 2002.№10.С.162—165.

是我国学界在此方面的缺憾。专门论述俄罗斯政教关系的文章有傅树政、雷丽平 1994 年发表的论文《卫国战争时期苏联政教关系的正常化》^①，论述了卫国战争爆发后，苏维埃政权改变了镇压宗教的政策，东正教会也积极投身于反侵略的战争之中，为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一定贡献；傅树政 1995 年发表了论文《战后斯大林时期苏联宗教政策剖析》^②，他认为东正教在苏联战前一直处于被镇压、被打击的地位，卫国战争爆发后斯大林改善了同宗教的关系实现了政教关系正常化，战后斯大林仍然继续战时的宽容政策。以上的两篇论文分别是注重阐述了二战期间和二战后苏联的政教关系的情况，而没有对战前的情况进行详细的阐述；韩全会在 2004 年发表的论文《浅谈俄苏时期的政教关系》^③中，讲述了东正教自它传入俄罗斯一千多年以来的发展历程，它与苏联、俄罗斯的政教关系也呈现出复杂的多样性。韩全会的文章只是从整体框架的角度进行的论述，他关注的问题仅仅是苏俄时期政教关系的整体特点，然而百年历史的复杂情况很难用寥寥几千字说清，只能是浅尝辄止而已；徐方治 1995 年发表的文章《原苏联在宗教问题上的一些重大错误》^④只是粗糙的讲述了苏联政府在宗教政策上犯了一些错误，即对宗教组织和神职人员的过火政策。除此之外，王春永的《浅析东正教对俄罗斯社会的作用和影响》^⑤及蒋莉的《东正教在俄罗斯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及影响》^⑥等文章中也涉及到一些有关政教关系的问题。

除此之外，有关政教关系的论述主要散见于一些学者的东正教论著中，如：乐峰《东正教史》^⑦，它是中国当代学术界系统研究东正教的首次尝试，这部专著由 17 章和 13 个附录组成，内容涉及东正教起源、形成、特点和它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和发展情况，详细的论述了俄罗斯东正教的历史现状及东正教在俄罗斯帝国历史上的政教合一的关系等问题。本书是一部宗教史图书，对本课题的写作是不可缺少的资料；傅树政、雷丽平合著的《俄国东正教会与国家》（1917—1945）^⑧一书以笔记体的形式叙述了东正教在苏联历史中的变化，东正教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经历了哪些曲折及苏联宗教政策的利弊得失等问题。这部著作堪称我国东正教研究领域中的一部力作，作者是从历史文化因素角度进行研究，为了解苏联时期的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由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民族与宗教研究中心编著的《周边地区民族宗教问题透视》^⑨和《世界宗教问题大聚焦》^⑩两本书中都涉及到了东正教与国家政权的关系的问题，这些论著对本课题来说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译的《苏联宗教政策》^⑪一书，分正文和附录两部分，正文包括苏联党和政府自 1903 年到 1977 年颁布的有关宗教和教会的决

^①傅树政、雷丽平：《卫国战争时期苏联政教关系的正常化》，《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 年第 2 期，第 77—83 页。

^②傅树政：《战后斯大林时期苏联宗教政策剖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5 年第 6 期，第 52—57 页。

^③韩全会：《浅谈俄苏时期的政教关系》，《俄罗斯研究》，2004 年第 3 期，第 56—59 页。

^④徐方治：《原苏联在宗教问题上的一些重大错误》，《东欧中亚研究》，1995 年第 4 期，第 54—58 页。

^⑤王春永：《浅析东正教对俄罗斯社会的作用和影响》，《现代国际关系》，1999 年第 7 期，第 25—27 页。

^⑥蒋莉：《东正教在俄罗斯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及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02 年第 9 期，第 48—53 页。

^⑦乐峰：《东正教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

^⑧傅树政、雷丽平：《俄国东正教会与国家》（1917—194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年。

^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民族与宗教研究中心《周边地区民族宗教问题透视》，北京：时事出版社，2002 年。

^⑩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民族与宗教研究中心《世界宗教问题大聚焦》，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 年。

^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译《苏联宗教政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0 年。

议、法令、指示、条例和通知。附录包括苏联报刊自 1954 年到 1979 年宗教问题发表的重要社论和文章，本书收集了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几个不同历史时期就宗教和教会问题所制订的政策文件。通过对苏联的宗教历史与现状的全面系统了解，对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更好地贯彻党和政府的宗教政策提供了借鉴。沈志华主编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①（第 2 卷）中“苏维埃政权与东正教会”（1918、4—1928、1）一文专题选编的 137 件档案，反映了从 1917 年到 20 年代末，苏维埃政权对东正教政策的变化，俄共主要领导人宗教问题的种种考虑，东正教会在苏联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状况，以及国家和教会之间的激烈斗争，特别是东正教教会被镇压和被剥夺的概貌，他主编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②（第 16 卷）中“英国国教会和俄罗斯东正教代表团的互访”专题，本专题文件反映了自卫国战争爆发后，苏联与英美等国建立了反希特勒和德国的同盟，俄国的东正教才获得了与其他国家宗教组织恢复联系的机会，以及苏、英两国教会进行互访的一些情况。以上的论著涉及的史实对本文来说是宝贵的资料，可惜的是他们没有全面系统的论述斯大林整个时期的政教关系。

从上述国内外学者的论著看，他们主要是从研究俄国史或教会史的角度，对俄国政教关系有所论及，但都不够系统、全面，尚有许多问题未能解决，例如：各历史时期政教关系的特点是什么，促使政教关系变化的决定因素是什么等等，因此，本人认为，有必要对俄罗斯政教关系的某些问题做进一步探索。

关于政教关系的概念我们可以从宗教方面进行阐述，也可以从政治方面进行阐述，可以有广义的解释，也可以有狭义的解释。从学术角度上认为：所谓“政”，可以指“政治”，也可以指“政府”；“教”可以指“宗教”，也可以指“教会”（宗教组织），这样就会产生出“宗教与政治”、“宗教与政府”、“教会与政治”、“教会与政府”这样四对不同概念的关系。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上还存在“宗教与社会”、“宗教与社会组织”这两种关系。所有这些不同的范畴，又可按内容分成意识形态、组织结构、社会活动三大类。因此，政教关系的概念是非常复杂、非常丰富的。但在所有这些关系中，最重要、最核心的是“教会与政府（宗教组织与国家）”这一对关系。^③这种“政教关系”恰是笔者要研究的“政教关系”，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俄国的历史上，东正教在思想领域一直占有主导地位，因此本文要研究的政教关系其实就是斯大林时期苏联国家政权与东正教会的关系。

目前根据国内外学者研究的成果可知，大多数学者都是注重研究苏联之前的政教关系，而对苏联典型的斯大林时期政教关系还没有做过系统的研究。笔者试图通过政教双方相互影响的互动性，用现代人的眼光客观地评价斯大林时期苏联政教关系问题，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把握当时苏联的历史，同时对于我国更好的处理政教关系也有一定的历史借鉴意义，又给当今各国处理政教关系带来了启示和思考。

^①沈志华：《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 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2 年。

^②沈志华：《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16 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2 年。

^③<http://www.ccforum.org.cn/viewthread.php?tid=33874> 2005-12-14 11:43

一、俄国和苏俄时期东正教会与国家政权关系的历史回顾

——（10 世纪末～1924 年）

（一）东正教是俄罗斯人的选择

东正教是基督教三大派别之一。基督教产生于公元 1 世纪罗马境内的巴勒斯坦地区，最初为犹太教中拿撒勒派，公元 135 年脱离犹太教，成为独立的宗教。起初基督教发展是比较艰辛的，受到罗马帝国皇帝的残酷迫害，后来因自身力量发展比较迅速，最终在公元 392 年罗马帝国颁布法律，规定基督教成为罗马唯一合法宗教，正式成为罗马帝国国教。但是随着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个罗马帝国，基督教会也分成东西两派，二者分别以君士坦丁堡和罗马为中心。公元 1054 年，东、西两派教会正式决裂。东部教会自称正教即东正教，西派教会称为公教。到 16 世纪时欧洲掀起宗教改革运动，于是又从天主教中分裂出一系列的宗派，总称为新教。自此基督教分成了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三个派别。“据 1989 年统计，全世界信仰各种宗教的人数有 42 亿，占世界总人口 78.8%：基督教人数最多(约 17 亿)，伊斯兰教次之(约 9 亿)，佛教居第三位(约 3 亿)。基督教三大派中人数最多的是天主教(约 9.7 亿)，其次是新教(约 4 亿多)。东正教居第三位(约 1.6 亿)，分布在 98 个国家内，前苏联在其中占 9 千万人，绝大多数是俄罗斯境内的俄罗斯人。”^①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人口约有 1.5 亿，其中东正教徒就有 7000 万左右。可见，东正教在俄罗斯拥有庞大的信徒，它的发展趋势是不可低估的。

俄罗斯东正教源于拜占庭，它于公元 988 年，即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执政时期传入俄罗斯，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在这千年的历史中，东正教在俄罗斯国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这个国家的形成和发展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东正教才得到统治者和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在国家享有“准国教”的地位。可是为什么在弗拉基米尔大公统治时期，基督教能够传入基辅罗斯公国呢？

从内因角度看，在弗拉基米尔大公统治时期，俄国封建统治者企图用各种方式巩固自己的统治，作为意识形态的基督教，在 3 个方面符合基辅罗斯封建统治者的利益：

一、形成于原始社会的多神教已不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②罗斯人在接受基督教之前是信奉多神教的。多神教是在社会生产力比较低下的原始社会形成的，但到了封建社会它的弊端越来越明显，譬如：多神教徒不喜欢甚至不允许异族进入自己的土地，这显然不利于经济、文化交流。这种做法被周边封建国家视为野蛮人的陋习，影响了罗斯与外界的往来。而基督教是一神教，教徒只信一神，相应的只能服从于基辅大公。这样首先有利于基辅罗斯势力的增强。其次，基督教对封建制度的形成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多神教只是崇拜自然神灵，而基督教却是告诉人们要学会容忍人、学会爱人，拥有博爱

^①张达明：《俄罗斯东正教与文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6—7 页。

^②沈影：《析当今俄罗斯东正教复兴的现象》[D]，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2004 年，第 2 页。

的思想。因此，在罗斯基督教取代多神教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二、把东正教引入罗斯后，可以把它变成维护国家统治的有利机器。基辅大公及其上层统治者非常欣赏拜占庭的政教关系，即国家领导教会，教会成为国家维护统治的有利工具。弗拉基米尔之所以选择基督教，是因为基督教对他维护统治有益。

三、东正教自身的特点也符合基辅罗斯的需要。一是东正教强调政教合一，有利于提高王权，加强统治。弗拉基米尔认为“把北方征服者的军事统治同拜占庭皇帝的神权专制制度合为一体，从而同时成为他的臣民和在地上的主人和天上的庇护者”。二是东正教允许民族教堂的存在，允许用民族语言传教和进行宗教仪式，从而更利于被罗斯人民所接受，同时能够保持宗教的独立性，避免同化。^①

从外因角度看，基辅罗斯公国与拜占庭帝国两国长期以来有着较多的政治经济关系，选择拜占庭式的基督教为国教，对基辅罗斯大有好处。公元987年，拜占庭皇帝瓦西里二世向弗拉基米尔请求帮助平定国内叛乱，条件就是瓦西里二世把妹妹安娜嫁给弗拉基米尔，而弗拉基米尔必须皈依基督教。这样拜占庭皇帝借此巩固了皇位，而罗斯公国也跻身于当时的强国之列，同时也是它实现外交的必要手段。

历史也证明：弗拉基米尔把东正教作为国教，是具有重大的意义。东正教不仅使基辅罗斯的势力增强，也促进了封建制度的形成，同时又把先进的拜占庭基督教文化源源不断的引入罗斯。此外，“在国际关系上，基辅罗斯成为欧洲众多的基督教国家中的一员，进入了欧洲国际政治的轨道，同欧洲各国联系加强，皇室之间的联姻也成为可能。过去地处偏远，鲜为人知的基辅罗斯，此后闻名四方。”^②

东正教在基辅罗斯占有特殊地位，统治者一直把它作为维护统治的精神支柱和有利的思想武器。因此东正教一开始就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的发展具有密切的关系，这种情况延续了千年，至今仍在发挥着作用。我们下面就从政教关系的角度来看俄罗斯东正教的历史。

（二）俄国时期东正教会与国家政权关系的发展简史

1988年，苏联在庆祝东正教传入俄罗斯1000年时提出了这一响亮的口号：“俄罗斯与东正教——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母亲！”^③可见，自从东正教传入俄罗斯起，东正教就深刻地影响着俄罗斯国家、俄罗斯民族、俄罗斯文化和俄罗斯的民族精神。东正教不仅使俄罗斯民族一直保持着统一的思想，拥有强大的民族意识，而且对于俄罗斯国家的形成也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下面我们就先简略的回顾一下苏联之前东正教的发展史。

1、古罗斯时期的政教关系——政教依赖期(10世纪末~15世纪末)

罗斯国家随着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确定拜占庭东方正教为罗斯国教，东斯拉夫人的传统宗教多神教便淡出了历史舞台，于是东正教在罗斯国家开始了它的发展历程。到鞑靼蒙古人入侵前夕，罗斯已经成为单一宗教(东正教)国家。这既巩固了基辅国家的封建关系，又加强了罗斯和拜占廷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罗斯社会的发展。基辅罗

^①沈影：《析当今俄罗斯东正教复兴的现象》，第2页。

^②张达明：《俄罗斯东正教与文化》，第11页。

^③韩全会：《浅谈俄苏时期的政教关系》，《俄罗斯研究》，2004年第3期，第56页。

斯时期是东正教会在罗斯的建立和发展时期，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利益，积极地推行、扶持东正教，借以歌颂、美化自己；同时东正教会也依附于封建统治阶级，发展自身的势力。

蒙古统治罗斯长达 200 多年，这段时期是东正教会政治、经济实力最强大的时期，教会成为蒙古统治者和诸公国王公竞相利用的社会力量，如：起初教会和诸公国都依附于强大的蒙古可汗，教会在蒙古统治者和封建王公之间斡旋，利用蒙古统治者的支持摆脱封建王公的束缚。后来莫斯科大公为壮大势力，极力拉拢教会；教会也看到蒙古统治末日渐近，最终和莫斯科公国合作赶走了蒙古统治者。

2、俄罗斯时期政教关系——政教默契期(15 世纪末~1917 年 10 月)

在俄国君主制政体确立的过程中，政教双方相互利用，即政权需要教会的精神支持来维护自身的统治；同时，俄国东正教会也经历了一个摆脱拜占庭牧首区控制和争取民族宗教独立的过程，它同样也需要政权的帮助和支持。特别是在 16 世纪中叶以后，实现“莫斯科—第三罗马”的理想成为俄国政教双方共同努力的目标。政教双方的共同利益决定了俄国政教关系的协调与默契。当然二者的利益并非完全一致，也存在着矛盾。譬如：伊凡四世在确立俄罗斯沙皇专制制度时，曾经对教会进行了改革，清除了高级教士对实施特辖制的阻碍，从而进一步集中了皇权；彼得大帝时再次对教会进行了改革，使教会逐步成了国家对内统治和对外进行侵略的工具。

到 20 世纪初，在俄国诸多的宗教派别中，东正教一直占据统治地位，享受着国家的种种特权，同样东正教会仍是国家维护对内统治和对外侵略的有利思想工具，因而，这一时期东正教和国家基本上保持着一种相互配合和相互利用的关系。

(三) 列宁时期政教关系——政教分离期(1917 年 10 月~1924 年)

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后，苏维埃政权颁布了一批有关宗教的法令，这些法令奠定了新型国家政教关系的基础。宣布“教会同国家分离，教会同学校分离”、“全体公民都有信教和不信教的自由”。这说明了东正教会失去了国教的地位，同时国家大力宣传无神论，一般学校禁止讲授宗教教义，这严重打击了东正教会势力，它的财产和特权也被剥夺了。这些法令在东正教会人士内引起一片愤怒的呼声，他们起来煽动教徒反对新政权，特别是大饥荒发生后，苏维埃政权以赈济饥民为名，决定没收教会财产中的一切金银珠宝和珍贵文物，这种做法促成了政教关系的白热化。东正教大牧首吉洪号召教徒们保卫宗教和教会，与苏维埃政权进行抵抗。因而，有不少人因反苏维埃而受到法律制裁，又出现了 1922~1923 年轰动国内外的“吉洪审判案件”。最为典型的是 1922 年苏维埃国家成立的“国家与教会分离委员会”，由它来全权处理宗教问题。这个机构的主要任务，就是用各种方法与教会作斗争，直到瓦解或消灭教会组织。随后，这个机构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瓦解和分裂俄国东正教会。后来东正教的领导人逐渐认识到与政权对立最终只能自食其果，于是转变了当初对苏维埃政权的敌对态度，公开发表声明支持新政权，愿意遵守国家的法律，即使这样东正教会的地位也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

这时期的东正教及其教会的命运，正经历着它自从传入俄罗斯国家以来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最艰难的考验。

二、斯大林时期苏联东正教会与国家政权关系的嬗变

斯大林在苏联历史上执政将近 30 年，是执政时间最长的领导人。这一时期，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了发达的工业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辉煌业绩；同时，这个时期也经历了希特勒法西斯分子侵略的严峻考验，所有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由于主观和客观方面的种种原因，斯大林也犯过一些错误，比如搞个人崇拜、“大清洗”、以及大国沙文主义等等，这些问题早已经得到研究并有了基本确定的答案。但是，在政教关系方面，斯大林时期却是很值得研究的一段历史。

东正教会在斯大林战前时期，它仍然处于受打击、被压迫的地位。直到卫国战争爆发后，斯大林政府才迫于国内外环境的影响改善了同宗教的关系，实现了政教关系正常化。战后，斯大林没有实施战前的宗教政策，而是继续战时宽松的宗教政策，主要因素是以东正教为代表的各宗教，在苏联当时的内政外交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这种作用是任何因素都无法代替的。斯大林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主观上意在利用宗教巩固他的政府统治，以实现其大国主义目标，客观上却开创了和平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一种新型的政教关系。当然这种政教关系是以有利于国家利益为前提，不过东正教也利用这种政教关系的环境有了其新的发展机遇。因此，本部分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论述斯大林时期苏联东正教会与国家政权关系的嬗变。

（一）二战前苏联东正教会与国家政权关系

1、战前斯大林政府的宗教政策及其原因

（1）、战前斯大林政府的宗教政策——恐怖的行政手段

自从斯大林执政后，他坚持宗教始终纯粹是“麻醉人民的鸦片”的理论，于是就把“揭露任何宗教虚伪性和同工农利益的矛盾，揭露各种宗教团体同统治阶级的利益之间的联系”以及“完全摧毁剥削阶级同宗教宣传组织之间的关系”^①作为党的任务。因而，一切宗教组织和神职人员就成为苏联政权的打击、镇压的对象。1931 年斯大林在公开回答美国记者的电报询问时表示：苏联的神甫们不断的受到追捕、受到迫害，可是他还是比较遗憾的是到现在为止也不能铲除他们所有的人。这很明显的反映了苏联政府对宗教实施打击的坚决态度，同时实施了具体的宗教政策来限制宗教。

1926 年苏联颁布和实施的《苏俄刑法典》，对宗教活动的规定和限制是非常苛刻的。其中如：“在国立和私立学校中向幼儿人和未成年人传授东正教教义，或是违犯此项法律的，判处一年以下劳动改造；为教会或宗教团体的利益而强迫募捐者，判处 6 个月以下劳动改造或 300 卢布以下罚金；宗教或教会组织，擅自利用行政、审判或者其他公法上的职权和擅自行使法人权利者，判处 6 个月以下劳改或 300 卢布以下罚金；在国家的或公共的机关、企业中举办宗教仪式，或者在上述机关、企业中悬挂某种宗教画像者，

^①《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年，第 321 页。

要判处 3 个月以下劳改或 300 卢布以下罚金；对以宗教信仰或其他个人信仰为借口拒绝或逃避服义务兵役者，要判处剥夺 3 年以下的自由。因此项法令而被关押劳改的神职人员数量是相当多的。”^①另外“1928 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吸收了 CHK 俄罗斯联邦的《关于宗教的联合》决议，用它来代替宗教和所有社会生活领域的教会，禁止他们组织儿童、青年及妇女的祷告聚会，禁止开放图书馆和阅览室，……”^②。之后，1929 年提出修改俄罗斯联邦的宪法，取消所有宗教宣传的自由，同年 4 月，苏联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又颁布了《关于宗教组织》的决议。此决议对宗教组织的申请、批准活动和使用的建筑物、财产等权利又作了非常具体而又严厉的决定。

从以上宗教法的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是对宗教组织和宗教人士活动进行严格限制和压制的法令，这使神职人员的活动范围就进一步缩小了。难怪以后会出现大批教会人员、教徒被送进监狱或者进入劳动营，因为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就触犯了宗教法。

苏联当局除了颁布宗教法外，还在全苏范围内开展了群众性的反宗教宣传运动，以群众政治运动的形式来进行反宗教斗争，企图在较短时间内把宗教意识形态从根本上清除掉。“有一种常用的宣传方法，是将诗句印在包糖纸、香烟盒等诸如此类物品的上面。当时流行的包糖纸上印下如下诗句：

教士就是我们的生死仇人！
用两只眼牢牢瞪住他要紧。
让我们五年计划四年完成，
来答复教皇的诬蔑谤陷。
用文化赶跑宗教和酒精。”^③

对此，原苏联党也不得不承认：“中央和各地经常故意采用粗暴的办法，不是认真地进行分析和解释，而是嘲弄信仰和崇拜的对象。”^④结果，在这种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冲击和政权压力下，苏联的宗教势力和影响似已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据统计，“1929～1930 年间是销毁教堂的高潮时期。从 1930 年到 1934 年，寺院和教堂的数目减少了 30%，甚至许多小教堂和小礼拜堂都没有幸免，许多牧师被镇压。”^⑤教堂的关闭常常伴随着他们的野蛮的破坏。“在莫斯科消灭的不仅是 10 所教堂建筑，重要的是这里还包括受教徒仰慕的以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和美学价值的教堂建筑。”^⑥如：在莫斯科，寺院和教堂的破坏程度尤为严重，由于教堂、寺院被摧毁，某些街道已到无法辨认的程度。莫斯科基督救世主大教堂——俄罗斯最大的建筑，是为纪念 1812 年战胜拿破仑建筑的，1931 年被毁。史料记载：“克里姆林宫内的丘多夫和沃兹涅先斯基大教堂，几乎‘中国城’内的大部分教堂，西蒙诺夫修道院的大部分建筑，红场旁边的契尔文斯基圣母小教堂和其他许多教堂都被捣毁。”^⑦除此之外，座落在彼得帕夫洛斯基广

^①傅树政、雷丽平：《俄国东正教会与国家》（1917—194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年，第 132 页。

^②Бабкин М.А. Приходское духовенство Россий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и свержение монархии в 1917 году, С.42.

^③[俄]赫克：《俄国革命前后的宗教》，第 349 页。

^④《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第 322 页。

^⑤Бабкин М.А. Приходское духовенство Россий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и свержение монархии в 1917 году, С.42.

^⑥Алов А.А., Владимирев Н.Г., Овсинко Ф.Г. Мировые Религия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РИОР, 1998.С.108—109.

^⑦傅树政、雷丽平：《俄国东正教会与国家》（1917—1945），第 134 页。

场上的圣三一大教堂在 1933 年（圣三一大教堂是 1710 年开始修建的，保持着首都早期建筑即巴洛克式风格，此教堂在 1927 到 1928 年间曾被修复，而 6 年后又彻底被毁了。）就被拆毁。到 1939 年东正教会保留下来的没有被关闭的还有 8300 所教堂，但是他们中大多数不能使用。在整个俄罗斯联邦的 25 个区域没有任何能应用的东正教会教堂。^①残酷的国家检查机构设置在教会中，消灭了大量的教会档案，其中的一些教会档案是具有历史价值。至此东正教昔日的繁荣和喧嚣，被长期的冷落和凄凉所代替。

东正教会出现的这种景象都是斯大林政府对宗教实行恐怖、行政手段而带来的，这种疯狂的反宗教运动可以说是世间罕见的。这也严重破坏了苏联的历史文化遗迹，对苏联来说这种损失是无法估计的。西方学者对肃反运动中对教会的迫害有着一种愤怒的情绪，他们认为苏联当局当时对教会的迫害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②

与此同时，政府进行的无神论者反宗教宣传运动也给宗教带来更加沉重的打击，其中以官方的“战斗的无神论者协会（Союз воинствующих безбожников）”（官方组织的一个反宗教的群众组织）为主，它在 1925 年时出现，1947 年解散。史料记载：“协会出版了自己的报纸《无神论者》报，领导这个组织的是以雅罗斯拉夫斯基为首的中央理事会，它领导 9 万 6 千个地方基层支部。由联共（布）莫斯科市委负责出版的反宗教刊物《机床旁的无神论者》发行 7 万份。“战斗的无神论者协会”的成员从 1929 年开始仅用四年的时间从 46.55 万人增加到 800 万人。这个组织有一个著名的口号是《同宗教的腐蚀作斗争，为社会主义而斗争》”。^③在这些年中，“战斗的无神者协会”在反宗教运动中所造成的物质上的损失是无法计算的，除直接毁坏外，宗教艺术品（国宝）的丢失，包括制造艺术品秘密的泄露等等，损失是无法估价的。当然，更大的损失是精神道德的损失，国内居民的道德文化水平严重滑坡，然而这些损失都没有被当时的党和国家所重视。^④

结果到 1937 年，苏联农村已有约 1/3 的居民和 2/3 以上的城市居民同宗教断绝了联系，认为苏联“深刻的社会变革和共产党的巨大的教育工作在战前年代已使劳动人民对宗教的态度发生了根本转变。”^⑤但实际上到卫国战争时期，人们又大批的返回了教会，宗教活动又迅速恢复发展起来。

（2）战前斯大林政府对宗教采取恐怖手段的原因

斯大林政府为什么采取如此恐怖的宗教政策呢？这就要从国家和教会的利益来看，苏联国家的阶级性质决定了与教会之间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苏联要想实现社会主义，就主张消灭宗教，特别是在思想上和世界观中体现的更为明显，在列宁时代这种矛盾就已经体现出来了。列宁主张与宗教进行斗争，只不过是强调以思想斗争为主，反对行政命令手段，可到了斯大林时代，国家政权已经是一种高度集权体制，这种体制就加深了政教关系的矛盾。斯大林无论是从国家政策出发，还是个人的立场出发，都希望尽快消灭宗教。因为宗教是与无产阶级世界观和科学观格格不入的；同时，为了广泛的推广无

^①Бабкин М.А. Приходское духовенство Россий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и свержение монархии в 1917 году, С.44.

^②傅树政、雷丽平：《俄国东正教会与国家》（1917—1945），第 155 页。

^③Васильева О.Ю.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1927—1943 годах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4 №4 С.39.

^④傅树政、雷丽平：《俄国东正教会与国家》（1917—1945），第 135—136 页。

^⑤[苏]М·П诺维科夫主编《宗教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1990 年，第 389 页。

神论理论，让人民拥护苏联政府，在意识形态领域排除宗教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因而不惜一切代价的消灭宗教。历史的今天已经证实：当时苏联政府的宗教政策对一切宗教组织及其神职人员采取无情打击和坚决镇压、消灭的政策，是原苏联党领导人在宗教问题上犯下的一个重大错误。苏联政府进行的反宗教运动，虽然使宗教公开活动受到了限制，但宗教活动并未停止，反而悄悄地转到地下进行活动，同时拉大了广大受宗教影响的群众与苏联党和政权之间的离心倾向，使党和政府脱离了群众；一旦某种条件具备，这种倾向就会形成反对党和政府的社会力量，从而给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各民族的团结埋下了祸根。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在反宗教运动中，他们在思想领域上出现了误区，即大搞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神化”的思想来取代对“上帝”和“神”的崇拜，其结果不但没有消灭宗教，反而加深了宗教在人民思想领域的影响，而一旦这种个人“神化”破灭时，信仰危机就会迅速转化为新的宗教狂热。

二战前，俄国东正教会虽然面对苏联国家疯狂镇压和迫害，但它还是以惊人的毅力克服重重困难生存下来。

2、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命运

马克思和列宁曾经指出：宗教是“被剥削阶级由于没有力量同剥削阶级进行斗争”因而去追寻的一种“思想上的安慰”和“对死后的幸福生活的憧憬”；是“一种精神上的劣质酒”和“麻醉人民的鸦片”这是从本质上对宗教的社会作用的深刻说明。可是原苏联党和政府由于指导思想绝对化、简单化，看不到消灭宗教的长期性、艰巨性，急于用行政手段来铲除群众心灵深处的宗教信仰。^①因此，他们在宗教政策方面上犯下了严重的错误，而东正教及教会也为此经历了一段艰辛的历程。

但是，要了解苏联时期的俄国宗教问题，必须了解“谢尔盖时代”。И.И.谢尔盖，原名斯特拉戈罗斯基（1867~1944），他出生于神甫家庭，从小就在宗教熏陶的环境下成长，他像其他宗教家庭的孩子一样一直就读于宗教学校，这对他日后选择终生服务上帝的职业有着深刻的影响。1925年吉洪（1918年任全俄东正教会大牧首）逝世后，谢尔盖开始履行作为俄国东正教大牧首临时代理人的职务。他为了维持教会的活动，做出很大的努力。尽管这时期对东正教会来说是非常时期，但谢尔盖并没有被困难所征服，还是决心主动取悦苏联当局，缓解一时之急。“1926年5月，俄国东正教才真正进入了谢尔盖时代。谢尔盖时代与斯大林时代几乎是同时开始的，这个时代不仅对宗教来说是它教会史中最悲惨的时代，就是对苏联人民来说，也是多苦多难的时代。但谢尔盖本人以其坚韧的意志和丰富的经验，终于顶住了政权对教会的重重打击，度过了俄国东正教史中最困难时期。”^②

1927年7月，谢尔盖发表了著名的《奉公守法的宣言》，宣言的基本精神是在政治上，东正教徒可以成为苏联的公民，但在信仰和世界观上，教会与国家是不能妥协的。牧首谢尔盖致信教徒说：“我们不能只在口头上，而且要在行动上证实我们是苏联公民。”

^①徐方治：《原苏联在宗教问题上的一些重大错误》，《东欧中亚研究》，1995年第4期，第54页。

^②傅树政、雷丽平：《俄国东正教会与国家》（1917—1945），第141页。

①“我们想成为东正教徒,但也认识到苏联是人民的国家,它的喜悦和成绩——就是我们的喜悦和成绩,而失败——就是我们的失败。”^②这一宣言表明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神职人员,必须保证奉公守法的对待苏联政权。宣言发表后,国外教会表示强烈的反对,他们拒绝遵守宣言的条款,更拒绝在宣言上签字。谢尔盖对国外教会不得不下最后通牒,这导致国外教会对于谢尔盖更加不满。幸好教会中的还有一部分人支持他的这种做法,即以退为进的策略,在危机中保存俄国教会,所以他们理解谢尔盖的苦衷,真正的大牧首的代理人彼得就一直支持和维护他。彼得的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不仅挽救了谢尔盖,也挽救了整个教会。

据记载,“1930年2月15日谢尔盖主教在国外和苏联记者面前,为讨好当局,他忍痛说了假话。声明苏联当局从未对苏联的东正教进行迫害,国家对教会的政策是公平的、有诚意的。”^③他这么做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得到苏联政权对教会生活的合法化的保证。然而谢尔盖在记者招待会的发言遭到国内外大多数神职人员的反对。1930年3月巴黎的《复兴》报道俄罗斯现在有些神职人员总之停止记住谢尔盖的名字。特别是伊斯兰教徒利扎·埃吉一别卡他声明的宣言,《他活了75岁,没有说过谎话,因此拒绝签署声明,即似乎穆斯林未遭到什么迫害》。对于这事几乎国外侨民报都鼓吹,避而不谈谢尔盖在自己讲话中所谈到的俄国东正教的现状。^④

尽管谢尔盖做出很大的努力,但是政府对教会的态度并没有多大的改变。苏联当局1929年成立“全苏战斗的无神论者同盟”(Союз воинствующих безбожников СССР)会员达300万,他们在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同时,也干了许多过火的蠢事。^⑤总的来说20世纪20年代初30年代末,俄罗斯东正教还是跌入低谷,教徒不及原来的十分之一。“从1929年开始仅10年的时间莫斯科科学院也遭到了残酷的清洗。这里面基本包括那些被称为《唯心主义者》,还有一些是吸收马克思唯物主义相对真理的人。在清洗过程中持续了很长时间,被判处枪决的将近100名科学院的领导者——几乎他们都是东正教的信仰者。”^⑥除此之外仅1934年以基里尔为首的6位总主教被捕,列宁格勒的镇压浪涛也汹涌而来。到1936年又有20名主教被捕,大牧首代理人彼得8月也死于流放地。这时期的东正教会的命运完全被白色恐怖的气候笼罩着。

针对国家对教会的镇压,教会试图抵制1936年12月的最高苏维埃的选举,改变教会的现状。其结果遭到新的镇压,即:一个新的布尔什维克口号“让我们与骄傲的基督徒战斗到底”诞生了。1937年,政府不仅逮捕了几乎所有的教士,还把关押在集中营的教士和信徒的子女送到孤儿院;同时,这年大约有35名总主教消失,一群群的神甫被枪杀,就连总主教安东尼也在此时无声无息的“蒸发”了。最终在这场肃反运动中不仅神职人员的数量急剧减少,连教堂和寺院也遭到严重的迫害。以列宁格勒地区高级神职

^①Поспеловский Д.В.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Истории РУСИ РОССИИ И СССР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РИОР, 1996.С.265.

^②Поспеловский Д.В.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Истории РУСИ РОССИИ И СССР, С.265.

^③Васильева О. Ю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1927—1943 годах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я, 1994№4.С.39.

^④Васильева О. Ю.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1927—1943 годах, С.39.

^⑤张达明:《俄罗斯东正教与文化》,第36页。

^⑥Поспеловский Д. В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Истории РУСИ РОССИИ И СССР, С.272.

人员的总数为例，仅在1937年便比1936年缩减二分之一，由总数79人减为25人^①。据记载，“从1937年开始仅三年就关闭了20500所东正教堂”^②。到卫国战争爆发前夕，俄国东正教会仅有3021所是可以应用的寺院，而且，其中有近3000所是在1939~1940年新并入苏联的领土上的，真正在原苏联领土上的寺院已“所剩无几”。^③

现在回头看东正教会在斯大林战前时期的悲惨命运，“这种情况有合乎规律的一面：人民群众文化水平提高；无神论宣传教育普及；老一代人去世，新一代成长。”^④当然这种情况也与斯大林的“左”倾错误脱不了关系。苏联当时的指导思想就是把宗教完全看成反动的，目标就是消灭宗教，对其存在的牢固性、长期性的特点及其产生的影响认识不足，因此苏联当局在宗教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即长期动用行政手段进行镇压和迫害宗教，致使出现许多人纷纷离开教会，过世俗生活。据统计，截止1932年，脱离东正教的人数达2500万之多。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它占全国总人口的1/4左右。^⑤

（二）卫国战争时期苏联东正教会与国家政权关系

1、战争爆发后，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态度及立场

1941年6月法西斯大举进攻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德军入侵的消息，震惊了苏联的每一个角落。希特勒的入侵对于俄国东正教会来说，无疑是对自己政策的考验。因为，有人认为，这一天给他们提供改变命运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么，面对法西斯的入侵的形势，教会究竟是采取什么态度和立场？是与政权并肩作战反对法西斯，还是希望这场战争两败俱伤，自己坐收渔利，从此打碎无神论的统治枷锁呢？出乎许多人意料的是，苏联东正教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反对外来侵略者的立场，奋不顾身的承担起救世观的使命，充分发扬了俄国东正教会爱国主义的历史传统。

卫国战争爆发以后，大牧首谢尔盖立刻发表爱国主义说教，他在一个场合强调指出：东正教总是赞同人们的命运……与他们一起经历它的考验，它的成绩。现在它不会放弃自己的人民。祝福她……当前全国人民面临自我牺牲的行为。^⑥据记载，战争开始的第四日，谢尔盖为胜利祈祷，号召更有意义的布道：让暴风雨来临吧，我们知道，它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不幸，而且会使痛苦减轻，是空气净化，使毒雾蒸发……。^⑦从此，俄国东正教会从大牧首代理人谢尔盖到普通的教徒，都积极投入到反法西斯爱国主义的自卫战中，他们或者拿起武器奔向前线，或者在后方支援战争。正是这些行动，为苏联政教关系的改善创造了前提。

由于苏军没有作好应战的准备，在战争的最初的几个月，德军进攻迅速，苏军连连败退，损失惨重。当德国进攻莫斯科时，谢尔盖发表公开信谴责那些被占领区域的牧师和神职人员与占领者勾结合作。尽管代理大牧首谢尔盖屡表爱国之心，但苏联当局对他

^①傅树政、雷丽平：《俄国东正教会与国家》，第156页。

^②Поспеловский Д. В.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Истории РУСИ РОССИИ И СССР, С.277.

^③Васильева О. Ю.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1927—1943 годах, С.41.

^④张达明：《俄罗斯东正教与文化》，第36页。

^⑤乐峰著：《东正教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42页。

^⑥Поспеловский Д. В.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Истории РУСИ РОССИИ И СССР, С.283.

^⑦Поспеловский Д. В.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Истории РУСИ РОССИИ И СССР, С.283—284.

还是不放心，在莫斯科被困期间把他送到屋里扬诺夫克（俄国的城市），但谢尔盖继续发表爱国主义书信，最引人注目的就是1941年11月11日号召教徒《进步的人们将以基督教文明的名义，为人类良心和宗教自由宣布对希特勒进行圣战》。^①声明的主要内容就是纳粹的种族主义政策将毁灭整个俄罗斯，号召人民起来保卫家园。可以说，东正教会在号召俄罗斯人民奋起抗敌、反对侵略中起了积极的作用。

1942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最困难的时期，也是苏联卫国战争最艰难的一年。就在最困难的时刻，谢尔盖又号召东正教会坚决支持苏联政府反对法西斯的入侵，强调俄国人民和东正教徒除了和纳粹决一死战外别无出路、别无选择。因为希特勒的目标是消灭整个俄罗斯，而东正教有责任保卫祖国安全，这是它的使命；同时，谢尔盖谴责波罗的海地区的投靠德国法西斯的卖国大主教。决议说：如果这个消息（即他们与纳粹的勾结）被证实是真实的话，那么主教们应采取必要的措施纠正他们的路线，……并向大牧首提交一份准确的报告，以便将来在教会法庭上有足够的证据审判他们。^②东正教的这些爱国主义行为的确激发了国民的爱国热情和保卫祖国的责任感，而东正教在意识形态唤起了人民的觉醒并尽快团结在一起，这种力量是任何东西都不能替代的，这就是东正教的魅力所在。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政权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不得不承认东正教的作用，在这特殊的战争时代迫使苏联政权重新思考与宗教的关系，是应继续政教对立的政策，还是在国难当头充分利用宗教的价值，这是很明显的了，况且这么选择对苏联当时政权是有利而无弊的。

2、斯大林政府调整宗教政策及原因

(1)、斯大林政府调整宗教政策

卫国战争爆发后，笼罩在苏联宗教政策上的恐怖气候开始解冻。其表现为：第一，整个的反宗教宣传，包括口头的和书面的，从政府的文件、报纸、广播中消失了；第二，已不再禁止谢尔盖代理大牧首的布道活动和演说，当然，这些讲演都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有反法西斯性质；第三，已不再禁止谢尔盖代理大牧首致全体教徒的公开信在全国教徒中传阅。根据1929年的苏联法律，这些活动显然是违法的。^③此外在1941年的十月革命节那一天，被德军包围中的莫斯科照例举行了庆祝仪式和阅兵式。而令人感兴趣的是斯大林在十月革命节上的讲话。这次讲话他把俄国人“伟大的先辈”——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季米特里·顿斯科依、库公马·米宁、季米特里·波扎尔斯基、亚历山大·苏沃培夫、米哈伊尔·库图佐夫等都列为当代人的楷模。由此，在苏联的各个领域都刮起了一股历史的民族主义风潮。以前的统治阶级代表人物、阶级敌人现在成为被赞颂的民族英雄。这是苏联政治路线变化的明显征兆：阶级矛盾下降、民族矛盾上升，这种政治路线的变化无疑有利于宗教地位的恢复。1942政府向东正教会做出的最大让步便是允许《俄罗斯教会真相》一书同时以几种文字出版发行。该书是国家出于对外宣传目的出版的，但书中对东正教会的看法已大大改变，如强调东正教会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有历史传统的，从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起直到当时，在俄国所有的反侵略战争中，教会

^①Поспеловский Д. В.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Истории РУСИ РОССИИ И СССР, С.284.

^②傅树政、雷丽平：《俄国东正教会与国家》（1917—1945），第166页。

^③傅树政、雷丽平：《俄国东正教会与国家》（1917—1945），第167页。

都起了积极的作用。”^①另一个有标志的事件是“1942年谢尔盖代理大牧首向斯大林发了一封电报：请以教会的名义在银行开个户头，可以存放教会募捐的国防捐款。斯大林回信表示感谢，并允许以教会的名义在银行开户头”^②。允许教会在银行开户头，就证实教会自苏联诞生以来首次拥有法人的地位。以上的这些表现都充分的证实了教会在苏联的地位开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在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之际，国家的宗教政策方针不可避免地发生改变，这是与教会人士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根据安全机关的报告，在1943年春、夏天之际，很多漂泊的神职人员鼓动教徒提出给予申请开放教堂的权力；而莫斯科的僧侣之间也散发出了这样的消息，经过主教的努力很快就征得了政府的同意。在事实上，某些地方政权已经拒绝实施之前对俄罗斯东正教压迫方针。“仅1942年在雅罗斯拉夫的14个区域无阻拦的进行，虽然不是官方的，就已经开始有51所教堂在应用”。^③到了1943年，国家与教会之间的关系出现伟大的转折，这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结果：一方面，在战争年代大部分僧侣和教徒的积极进行爱国主义活动，以及教会也在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显示出自己的力量，政府希望在战争过程中利用教会的作用即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另一方面，就是国际间外交的影响。1943年秋天准备召开德黑兰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人们寄予很大的期望，因同开辟第二战场相联系，苏联当局为了减轻对法西斯的两面作战，因而急需开辟第二战场。但是英美两国的国民及教会人士对苏联国内的宗教遭到的迫害表示极为不满，强烈要求改变宗教的命运，而且英国的宗教人士也不止一次的向其政府提出要求去莫斯科拜访的要求。这些不得不迫使苏联当局重新考虑政教关系问题。

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和战争的需要，斯大林在苏联历史上破天荒的决定接见俄国东正教三位宗教领袖，从而为苏联政教关系的改善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三位宗教领袖是：谢尔盖（莫斯科和卡罗缅斯克总主教，俄国东正教大牧首临时代理人（1925~1943.9）和东正教大牧首（1943.9~1944.5）、阿列克谢（列宁格勒和诺夫哥罗德总主教，后接替谢尔盖被选为俄国东正教大牧首（1944.5~1970））和尼古拉（基辅和卡林斯克总主教）。他们是当时俄国东正教最有影响的宗教元老。

1943年9月4日晚上，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三位宗教领袖。斯大林首先对东正教会自卫国战争爆发以来的爱国主义活动进行了高度评价，而后教会领导人在会议上提出解决实际的问题有关教区的开放、僧侣学术会议、教会出版权及大主教的选举等要求。这些要求基本得到斯大林比较满意的答复。同时，斯大林决定在苏联人民委员会之下建立一个俄罗斯东正教事务委员会（或称理事会，即CoBeT），这个委员会本身没有决定权，所有问题都要向政府报告，再把政府的决定通过委员会转达给教会^④。这样方便与教会沟通。

这次会谈的内容很快通知了报界，无论对苏联国内国外，这都是一条具有爆炸性的

^①傅树政、雷丽平：《俄国东正教会与国家》（1917—1945），第167—168页。

^②Постеловский Д. В.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Истории РУСИ РОССИИ И СССР, С.284.

^③Шкфровский М. В.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1943—1957 годах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5№8.С.36.

^④Священник Сергей горбун: «Ро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период с 1943 по 1970 год» // «Журнал Московской патриархии», 1993№1.С.39.

新闻；同时通告的还有英国教会代表团即将到达莫斯科的消息。这次历史性的会见和做出的决定，标志苏联政教关系向正常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之后根据会见的内容苏联东正教会不仅恢复了国内宗教活动，并且开始了国际交往，为苏联反法西斯战争争取国际支援做出了贡献。

一系列宗教活动证明了苏联的政教关系进入了新时期，即政教关系转入正常化时期。

（2）、政策改变的原因

苏联宗教政策的改变既有教会方面的客观原因，又有政府方面的主观意愿。

从教会方面看，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教会方面很早就有改善与政府方面关系的强烈愿望，尽早结束这种受限制及受迫害的命运，重新登上俄罗斯的政治舞台，享有“准国教”的地位以及种种特权。从二三十年代开始，俄国东正教领导人就多次公开讲话，表示教会服从苏维埃政权并愿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卫国战争爆发后，教会肩负起它传统的爱国主义的使命感，做出了许多爱国主义的活动，充分表达了东正教会的爱国主义立场、爱国的愿望和爱国热忱。应该说，这些实际行动为苏联政教关系改善奠定了基础；第二，历史实践的经验中证明只有与当局政府保持默契合作，才能有利于自己的发展，与其对立，只能自食其果。毕竟教会的力量无论如何都无法和国家的政权的力量相比。教会与政府对立，最终受伤的总是自己。俄国历史已经证明当政教双方发生矛盾时，教会必遭到政权的镇压和限制，最终成为政权的附属工具，失去自身的特权；第三，教会利用国家的允许、扶植的机遇，改变现今的历史命运，重新登上俄国的历史舞台，发展自己的力量，早日实现昔日的辉煌历史，因而它在特殊的历史时期采取以退为进、温和服从的政策，对其存在和发展是极其有意义的。历史也证明，东正教会的做法是正确的，它通过了历史的严峻考验，为日后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从政府方面讲，当时苏联国家的态度实际上就是国家主要领导人斯大林的态度。卫国战争爆发以后，斯大林已经发现，与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处于“敌对”状态的教会是有利用价值的。这是因为：第一，基督教本身就是拯救整个人类和整个世界的宗教，而俄罗斯的东正教完全继承和发展了这救世观使命感的思想。俄国的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写道：“很久以来就有一种预感，俄罗斯注定负有某种伟大的使命。俄罗斯是一个特殊的国家，它不同于世界上的任何其他国家，俄罗斯是神选的，是赋有神性的。这种情况起自莫斯科是第三罗马的古老观念，衍经斯拉夫，而绵延至陀斯妥耶夫斯基，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在延续到今天的斯拉夫主义。”^①这种救世的观念，特别是“莫斯科——第三罗马”的理论已经深深的渗透到俄罗斯人的意识当中，形成了他们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在国难当头的时刻，我们依然能看到教会继承这种使命感的影子，即谴责投靠法西斯的卖国牧师，坚持宗教忠于上帝和祖国的爱国主义信条。因此国家主权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国家迫切希望教会成为共同对敌的同盟者，成为国家反法西斯力量的坚实后盾，而不是袖手旁观的力量；第二，教会是拥有巨大物质力量的源泉。如果能把这股巨大力量利用好，把双方关系处理好，教会将对战争做出很大贡献。事实证明，

^①[俄]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的命运》，李惠生、盛世良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4年，第1页。

教会从各界募得的捐款用来慰问战士的家属，使战士的心灵得到抚慰，增强了战士的斗志，对支持战争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41年10月，代理大牧首谢尔盖向全国教徒发出“用捐款来支持我们英勇的保卫者”的号召。各教区的宗教团体向战需国防基金会捐献了数目巨大的捐款，仅莫斯科教区在战争的第一年内便捐款300多万卢布；高尔基市一个宗教团体捐款就达1.5万卢布。^①到1944年末，全国东正教会捐款总数达15亿卢布^②。用教会捐款建立起来的军队有：德米特里·顿斯科伊坦克纵队；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战斗飞行大队等；第三，教会成为国家在困难之际的有利的精神支柱。譬如：谢尔盖说：“在最近的几年里，我们俄罗斯的居民，总是拿希望来安慰自己：战争之火已蔓延全世界，但没有触及到我国。但是，只承认暴力是赤裸裸力量的法西斯……突然袭击我们，和平居民的鲜血染红了国土。但是，这对俄罗斯居民来说，已不是第一次经受这种考验……正是这个时候，祖国向我们教会的神职人员和教民发出号召，号召我们建立功勋。我们不能只是默默地看着周围发生的一切，不能只是胆怯和伤心，我们要让那些动摇不定的人不忘记义务，不忘记上帝的意志。如果还有神职人员站在一旁冷眼观看，或用滑头的想法计算自己的得失，将是对祖国和神职人员义务的直接背叛。我们的心是同教民在一起的，基督将赐福给所有的教民，去保卫祖国神圣的边界。”^③可见，教会在宣传、动员、号召、祈祷、祝福等多方面的的工作中，为政权抵抗法西斯的侵略发挥了自已特有的作用；第四，教会是在外交方面争取国际支援最有效的传播媒体。俄国东正教会向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的东正教徒发出呼吁：呼吁信仰基督的兄弟们，不要再相互残杀，不要再流兄弟的鲜血了，共同参加击跨人类共同敌人的神圣事业。苏联国家政权利用教会的这种影响和各国教会之间的关系，再通过其他国家教会向本国政府施加影响，将是获得物质上、道义上援助的最有效的触媒；第五，教会可以成为国家对内、对外扩张的最有利的思想武器。历史证明：东正教会对国家政权的巩固和扩张起到很大的作用。譬如：在俄罗斯沙皇时代，统治阶级一方面利用东正教这个传媒武器，进行同化、麻痹国民，让他们屈服、顺从政权；另一方面成为他们对外殖民扩张的幌子。因而，东正教不仅是维护统治阶级的精神支柱，更是实现大国沙皇主义的重要的思想工具。当然苏联当局也企望利用东正教会的这种价值，尽早实现它的大国沙文主义目标。

现在看，苏联领导人改善与教会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实用主义的和被迫的；同时，政教双方关系改善的主动权却是由苏联当局掌握着。不过苏联政府能在战争的特殊环境下迈出改善政教关系关键的一步，仍然是有其重大历史意义的。

3、俄罗斯东正教会开始恢复和发展

东正教新阶段的到来是和东正教的代理大牧首谢尔盖的努力紧密相连的。1943年9月斯大林亲自接见了东正教的领袖，是标志着政教关系进入新阶段的里程碑。

根据这次接见协商的结果，最高宗教会议于1943年9月8日在莫斯科如期召开，这次宗教会议是苏维埃国家建国后第一次召开的最高宗教会议，对于俄国东正教会来说，它具有极大的历史意义。谢尔盖登基后的一周，国家正式把前德国的大使馆转交给

^① Куроедов Б.А.: 《Религия и церковь в советско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ва, 1981.С98—99.

^② Куроедов Б.А.: 《Религия и церковь в советско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 М., С99.

^③ Куроедов Б.А.: 《Религия и церковь в советско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 М., С92—93.

东正教会。以后,谢尔盖大牧首又亲自接见了英国教会代表团访苏并表示问候。1943年9月《俄罗斯大主教杂志》第一期出版了。

宗教取得合法的地位后,教会的事业开始恢复和发展。大主教格利高里负责东正教的教育恢复。为此他详细地规划了中等教会学校和高等教会学校的方案,该方案是在东正教会的十月会议被赞许的。按他的观点,恢复的应是神学的,而不是简单的神甫培训学校,这些神学院和学校的开设的课程,符合革命前的神学教育大纲。除此之外,包括某些新学科《俄罗斯宗教思想历史》,这样思想被认为是崇高的,被认为是神学科学和俄罗斯神学传统的复兴。如果能实施的话,俄罗斯的传统文化就能够继续。可惜的是客观条件不允许它实现。还好,革命前一批旧神学教授还在,“如H.B.切鲁林、B. B.切得尔京、A. B.萨戈尔达、C. B.萨文斯基、T. Д.波波夫等,他们参加了1943年11月俄罗斯东正教的复活节。在这种形势下,苏联政府决定在莫斯科开设神学院和神甫培训班。到1946年时,它们升格为宗教神学院和神学中等学校。到1947年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萨拉托夫、基辅、奥德萨、明斯克、鲁萨、斯塔夫罗波尔和维尔纽斯等地共出现了2所神学科学院和10所宗教学校。”^①

此外,俄罗斯东正教会组织结构的复兴计划只是部分地实现,这个计划的制定是由副教授大主教卢卡策划。然而政权不希望强大教会组织的复兴,尤其是公开开放教堂最为不满。“到1944年2月,雅罗斯拉夫实际上拥有90多个教会。政权努力制止这水流扩大,要把它变成小溪。”^②于是“莫洛托夫在和卡尔托夫一次十月交谈中指出:《不给教会任何时候开放教会的允诺……下次在开放教堂的这个问题须由政府批准并在这之后由中执行委员会下令……开放教堂在许多地方取得胜利,但也要遵守这个决议》”^③。同年12月苏维埃政府做出关于官方首批开放18个教堂的决议,同时解放占领的领土乌克兰和边疆区等。一些地方恢复了高级僧侣做礼拜,建立天主教辖区的控制和蜡烛作坊,宗教管辖区继续进行反法西斯活动。从1943年莫斯科大主教开展了积极的国际活动,到1945年俄罗斯东正教成功地与很多国家建立了关系。如:东正教会与罗马尼亚、波兰、乌克兰、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

1944年5月大主教谢尔盖寿终正寝。他的逝世对俄罗斯东正教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之后东正教会才召开最高宗教会议,会议有两项议程。第一是通过俄国东正教管理状况的工作报告,通过俄国东正教新的决议和宗教法规;第二是选举阿列克谢为大牧首。此外,在这次宗教会议中形成了东正教宗教体制,以及这种体制与苏联各级政权的关系。当然这种关系是使国家更好的直接控制教会,使教会为其服务。只是政府对这些政策的改变从未有正式的文件,因此对东正教会来说并不是可靠的保证。不知哪一天这些权力就会被取消,自己又会面临新的打击。教会领袖们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还在1944年9月,苏联联共(布)中央便出人意料地公布了《关于组织科学教育宣传》的决定,其中谈到“克服文化落后、迷信及偏见的残余”^④问题,要求党、团、工会和国民教育机关、

^①Шкфровский М. В.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1943—1957 годах, С.38.

^②Шкфровский М. В.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1943—1957 годах, С.38.

^③Шкфровский М. В.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1943—1957 годах, С.38.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译:《苏联宗教政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0年,第79页。

文化教育部门要广泛开展对居民的自然科学知识宣传，“对自然现象作出唯物主义的解释”^①。这个决定显然是针对宗教的，是与宗教唯心主义宣传作斗争的决议。对教会来说这的确不是好兆头。

不过以上的论述还是能够证明俄罗斯东正教会在卫国战争的这种特殊的时期，它的教会地位的确有了大大的提高。

（三）二战后苏联东正教会与国家政权关系

1、战后斯大林坚持战争时的宗教政策及原因

卫国战争胜利结束后，苏联党和政府对待教会的政策没有改变，仍旧坚持卫国战争时期的宗教政策，即保障公民有真正的信仰自由，反对用行政命令的手段关闭教堂，避免伤害教徒的宗教感情。这也是苏联当局在过去实践中得到的经验。

苏联政府没有实施战前的宗教政策并不是与宗教的矛盾消除了，而是宗教的可利用价值仍然存在。

第一，当时的国际环境对苏联不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时刻寻找时机威胁苏联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权，况且以英美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掀起对苏联国家的反共浪潮，拉开了冷战的序幕，然而苏联自身刚刚成立不久，社会主义体制建设还没有完善，在加上卫国战争的破坏，此时苏联境内已经狼烟不堪，国内生产力严重倒退。虽然战后苏联已经成为世界上的两大超级强国之一，但与其对手美国争霸还是雪上加霜，过程还是比较艰苦，况且苏联国内斯大林个人的地位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二、三十年代的极左做法已经证实对苏联没有好处。因此，斯大林开始对国内的政策放松，以换取和平的环境来促进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这才是当时苏联最重要的问题。当然宗教也是苏联政策宽松的对象之一。

第二，在卫国战争中，斯大林及其政府已经认识到了东正教会的作用是国家自身无法取代的，毕竟它在战争中的爱国主义活动给当时的苏联政府雪中送炭。当然在巩固苏联在国际的地位，实现大国主义的目标教会有其积极的利用价值。因而在意识形态上的微小的退让就可以换来实际的利益，何乐而不为呢？同时国家的安定和社会的繁荣也离不开教会。因为四年的战争使人民饱受了人身摧残和心理摧残，战后又面临重建战争造成的巨大破坏和严重困难的物质生活，加上失去亲人的痛苦，应该说，人民还没有从恶梦中摆脱出来，急需寻找心里安慰，在战后教徒越来越多的形势下，政府只有与教会通力合作，共同医治人民心灵的创伤，才能稳定政局，鼓起斗志，尽快恢复经济。

第三，苏联在外交方面也急需东正教会这个触媒体。前面已经讲过，苏联面临西方国家威胁，苏联为了巩固国家的安全，必须在自身周围建立巩固的防卫地带，防止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犯。同时苏联国家沿袭了沙俄时期的大国沙文主义，侵略扩张领土仍是苏联的外交政策之一，虽然这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不符。因而在这种外交目标的影响下，苏联邻近的东欧国家及西部地区便成了苏联政府的眼中钉。但是历史证明对外国的侵略光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译：《苏联宗教政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0年，第79页。

用军事手段是行不通的。占领者要想征服民心,只能用东正教会来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因为东欧国家大多数都是信仰东正教的,大力宣传东正教的统一,进而把东欧的东正教会归并到莫斯科牧首区的管辖,最后在把这些国家纳入苏联境内;同时东正教可以化解这些占领区的民族主义。这些民族主义者的摇篮之一也是加里尼亚的原教仪东正教派,这个派别在 30 年代的时候就支持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它已经是一个拥有巨大势力的组织,它控制着乌克兰数量巨大的民族主义者和地下教区,只有东正教才能出面调解,最后取消了这个派别。可见,东正教会为国家对付占领区的民族主义立了大功,而教会自身也愿意为国家服务,充当国家对外侵略的有利工具。除此之外,东正教会在反对战争,保卫和平,反对美国入侵朝鲜,反对应用原子弹,及与很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等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四,东正教自身传统的救世观是苏联安全观强大的精神支柱。因为俄罗斯民族是一个宗教民族,宗教在这个国家社会生活中占有相当大的重要地位,东正教不仅与民族文化融为一体,而且深刻影响着俄国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在俄罗斯人心目中,俄罗斯不仅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大国,而且还因为肩负着某种神圣使命而注定要成为一个精神上的大国。”^①因此,“俄罗斯民族是带有神性的民族。富有世界性同情心是俄罗斯民族的特征。”^②这种强烈的宗教意识和救世主义理念成了推动俄罗斯大规模向外扩张的思想基础。历史已经证明,东正教在俄罗斯的扩张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而苏联政府要想实现大国主义也需要东正教的这种救世观的推动,虽然斯大林本人很憎恨宗教,但是宗教的利用价值的吸引力已经把他迷惑,况且战前对宗教的迫害政策,并没有使政府得到利益。

2、俄罗斯东正教会出现短暂的繁荣

战争结束后,政教关系仍维持战时的正常化关系。1945年4月国家领导人斯大林接见了东正教会的新大牧首阿列克谢及其他的宗教领袖,在这次接见中,政府满足了教会提出的要求;同时也给了教会满意的答复。另外,政府决定把莫斯科的圣三一修道院归还教会。这一庞大的建筑不仅满足了教会作为印刷场所之用,而且还容纳了迁自市内的神学院和教会学校。之后8月政府承认主教、教区的操纵者和教区宗教团体有发言、组织法律的权力;允许他们开放财政金额,缔结合同,创立企业和实行雇工的权力。^③东正教会在这种宽松的环境下恰好利用时机大力发展自己的势力,于是出现了暂时的繁荣景象。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东正教会正在按照计划扩充自己,最明显的就是开设神院校。如:“东正教会原计划扩建9所神学院,至少2所神学研究院,后在建设过程中又扩大为10所神学院和3所神学研究院。10所神学院的分布是:4所在乌克兰、5所在俄罗斯、1所在白俄罗斯;3所神学研究院分别设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基辅。”^④但是在神学院发展的道路上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到1947年,实际上最后完成的只有8所神学院和2所神学研究院。没有完成计划的原因是当时反教会势力的强大,

^①学刚、姜毅:《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外交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65页。

^②[俄]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雷永生、邱守娟译,北京:三联出版社,1996年,第67页。

^③Шкфровский М. В.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1943—1957 годах, С 39.

^④Шкфровский М. В.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1943—1957 годах, С 39.

无神论宣传活跃，使部分扩建计划无限期地被推迟了，最后不了了之；其二，东正教会还按计划新建或重新开放一些教堂，方便教徒和神职人员正常活动。1948年莫斯科教堂在数量上达到了战后自己发展的顶峰。“那时国家计算有14329所东正教堂，这些教堂中有1270所是在1945到1947年间开放的。1948年3月获得允许开放还有27所教堂，除此之外，东正教徒继续通过扩建的途径，到1949年初，教堂的数量达到了14477所，而到7月份神学院达到了13483所。”^①可见，此时东正教会自身的力量在不断的增长；其三，教会得到政府的允许可以在教区开放图书馆和阅览室；允许宗教团体出版印刷、小册子、祈祷书及在教区设立慈善事业。这些使教会加强自己的宗教传播，扩大了教会影响。因而教会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广，自身的实力增长也很快。东正教徒数量的增长有目共睹。“据统计，1947年仅列宁格勒就有东正教徒40万。在信教人中，青年人的比重上升，这体现在报考神学院考生数额上。从1949年开始到1950年，莫斯科的神学研究院共招生196名，1952年则增为400名，而列宁格勒也增到了320名。据统计，到50年代中期，苏联在校的神学院学生总数已超过2000人，此外，还有大批的校外函授生。这些学生的年龄都在30岁以下，他们毕业后可为教会服务35~40年。”^②因此，极大充实了东正教神职人员队伍的力量，弥补了因教徒人数的增加而出现的牧师数量的严重不足的现象。如：到1953年，仅莫斯科教区就新增加3万名牧师，新增2~2.5万名主教。至于教堂修建、重新装修、圣像和壁画的修复、尖顶的粉刷等等，在各地的教堂、寺院都在普遍地进行。^③

东正教在战后的宽松的环境里，迎来了它进入苏联历史以来的首次繁荣景象。

^①Шкфровский М. В.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1943—1957 годах, С.46.

^②傅树政：《战后斯大林时期苏联宗教政策剖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第6期，第52页。

^③傅树政：《战后斯大林时期苏联宗教政策剖析》，第52页。

三、后斯大林时期苏联（俄罗斯）东正教会与国家政权关系的嬗变

（一）后斯大林时期苏联东正教会与国家政权关系

1、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东正教会与国家政权关系

赫鲁晓夫上台后，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赫鲁晓夫，他从小就生活在苏联大力宣传无神论、反对宗教信仰的环境下，这决定了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并对宗教产生了憎恶感。“于是，在赫鲁晓夫指挥下，对宗教采取了‘左’的政策，结果出现了过火的行为，伤害了教徒的感情，干预了教会的正常的活动。过了不久，他又以右的面目出现，纠正‘左’的倾向，说什么情况发生了变化，多数教会的人士和教徒对政府采取了忠实的态度，要充分信任和同情他们。”^①此外赫鲁晓夫上台后，在国内掀起了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风气，使全国上下对党的信任感失去了信心，造成了苏联人民在思想和感情上的真空。结果当人民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破灭时，人民就迅速转入对宗教的狂热中。正是因为这些，东正教会利用这个相对宽松的国内气候，在苏联社会生活的影响下迅速恢复，并获得巨大的发展。教徒数量不断增长，教堂开放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当时在苏联社会，教会不再是苏联公众谨慎谈论的话题，不再是他们敬而远之的事物，宗教信仰的大门不再半遮半掩。一时间，俄罗斯东正教会又在苏联社会中扮演越来越活跃的角色。甚至，对苏联政权的政策风向一贯敏感的俄罗斯东正教莫斯科牧首公署也为教会在这时期取得的成就冲昏了头，又梦想着昔日东正教会地位的重现。

由于教会势力在苏联的扩张，宗教影响在不断扩大，宗教问题不能不成为苏联当局再次认真对待的首要问题。为了坚持苏联共产党的一贯政策，在苏联境内又一次刮起反宗教的风暴。赫鲁晓夫从1959年仅用6年的时间对教会进行了猛烈的打击，颁布了相关的政府命令和法律来限制教会的正常活动。在这6年里，教会特别是修道院进入了新的镇压阶段。东正教会1959年还有47所修道院在正常应用，可到了1960年仅仅剩下了16所。^②此外，莫斯科宗主教管辖的教区也从1958年的13414所教堂，12169名牧师，56所修道院和7所隐修院，到了1966年初只剩下7523所教堂，19所修道院，7410名注册过的僧侣人士。^③可见，仅仅几年的反宗教运动就给教会和群众造成了极大的损害，赫鲁晓夫的这种出尔反尔的宗教政策让人民对政府的威望大打折扣，思想上出现了迷茫，社会矛盾也在不断的激化，这些给当时的国家政权的巩固带来了极大的隐患。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继续赫鲁晓夫的路线，不过他对宗教政策进行了调整。鉴于赫鲁晓夫时期实行的反宗教政策造成的恶果和引起的社会动荡，勃列日涅夫采取的政策是：

^①乐峰著：《东正教史》，第145页。

^②Шмелев Г. М.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её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и экономика до и после 1917 года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3 № 11. С. 44.

^③Шкфровский М. В.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1958—1964 годах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9 № 2. С. 57.

摒弃群众运动打击宗教的方法,实行国家机关对宗教的高度的控制;高度重视法律手段,利用法律严控宗教的蔓延;在思想上加强无神论宣传,加强唯物主义教育,与宗教争夺思想阵地。^①他实施宗教政策的特点是,对宗教和教会采取了扶植、保护、利用和限制、打击和消灭交替的手段。因此教会为了适应这种环境,采取了一些相应的对策。如大力宣扬“基督教与共产主义有共性”,“共产主义原则和基督教原则完全一致”,“基督教道德与共产主义道德很接近,只是表达方式不同罢了”,“共产主义思想来自圣经”^②等等。另外,教会在科学方面的态度上也大有改变,他们经常高谈科学和基督教可以共存,也可以结成联盟等,这些都表明东正教会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断适应环境的变化。正因为这个时期的宗教政策,使东正教的命运在苏联的历史中出现了重要的转折点,即开始了又一次的复兴和发展阶段。

需要说明的是,“首先应该肯定勃列日涅夫的宗教政策要比斯大林时期和赫鲁晓夫的政策更加宽容和进步,但这不等于说勃列日涅夫的宗教政策已在实行正确的社会主义宗教政策,只不过表明勃列日涅夫在实行错误宗教政策方面,走得没有斯大林和赫鲁晓夫那么远,对宗教的控制和镇压没有那么严厉和残酷。其主要表现是,勃列日涅夫结束了以前执行的大规模的、群众的反宗教运动,有限度的实行了法治。”^③遗憾的是在他统治时期人民的宗教信仰也没有实现真正的自由,不过此时勃列日涅夫在总结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时期的宗教政策经验后取得的成果还是值得肯定的。

2、戈尔巴乔夫时期的东正教会与国家政权关系

戈尔巴乔夫当政后,与苏联前几任领导不同,他在总结这些领导的经验政策的同时,又根据时代和环境的变化而提出了改革、公开性、民主性、多元化的新思维,要在苏联各个领域进行反思,其中包括对苏联过去实行的宗教政策重新审查和评价,实行宽容的、开放的和民主化的宗教政策,对宗教的限制又进一步的放宽,宗教的热潮又有了进一步增长的趋势。如:信教的人数大幅度的增加。据统计,这个时期的东正教徒人数超过7000万,占全苏联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宗教活动场所猛增。80年代初,宗教活动场所7000多处,到1990年初增加到2万多处。^④同时传教活动广为开展,无论在教堂内,还是教堂外都可以传播基督教,传播的方式多种多样。允许教会人士参加政治活动,政府官员和部队官兵可以自由进入教堂过着宗教生活,参加宗教仪式,接受主教的祝福,以及成立了宗教政党。这一切都证明了东正教正在复兴起来,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些学者认为,东正教的复兴当然是与当时政府实施宗教政策的产物和结果:第一,是戈尔巴乔夫肯定了东正教传入俄罗斯1000年中对俄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第二,是戈尔巴乔夫全面地否定了苏联几十年的宗教政策,认为这种政策给东正教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同时也给苏联国家的历史文化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第三,是戈尔巴乔夫在全面反思的基础上,制定了新的宗教法,以满足教会及信教群众的要求;第四,是戈尔巴乔夫保证给东正教会传入俄国1000周年纪念活动提供必要的帮助;第五苏

^①陈之骅:《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42页。

^②乐峰:《东正教史》,第146页。

^③陈之骅:《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第243页。

^④乐峰:《东正教史》,第148页。

联政权要改善同教会的关系；等等。戈尔巴乔夫的宗教改革，为宗教的发展大开了绿灯，而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垮台则为宗教的进一步的发展和重新在俄罗斯历史上占据国教的地位扫清了障碍。

戈尔巴乔夫的宗教政策的成功之处在于，对过去极左政策和无神论教育中简单粗暴的作法进行了必要的纠正，但他的失败之处在于，国家在对宗教让步的同时放弃了马列主义的原则，无神论的宣传，乃至使苏联的宗教政策又出现了右的错误，这也是导致他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当今俄罗斯时期的东正教会与国家政权关系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各个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当然也包括东正教。东正教迅速摆脱长期处于无神论思想体系压制下的萧条状态，开始渗入俄罗斯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与国家政权构成了特殊的组合关系，并在俄罗斯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然东正教地位的变化，正是现今俄罗斯领导人在总结苏联国家宗教政策经验的基础上，重新肯定了它的历史价值。

1、宗教政策上吸取经验教训

苏联解体后，俄当局认真吸取苏联在宗教政策方面的教训，重新评价东正教的作用，有意借东正教思想来团结社会，增强民族凝聚力，使其再度成为“准国教”。东正教也借机大力拓展势力，加紧发展教会事业，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已成为一股十分引人注目的社会力量，在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现今俄罗斯前任总统叶利钦和现任总统普京都是虔诚的东正教徒，二人都十分重视宗教的作用，希望这一传统的宗教在新世纪得到复兴。因此在对待宗教和教会的问题上都主张对宗教和教会实行放宽的政策，多次接见教会的领袖以及到教会祈祷。在这种宗教感情和政策的影响下，俄罗斯东正教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东正教会的地位得到了提高，其作用不断增强，不仅自身势力（教徒人数不断增多，教堂内外盛况空前，东正教的教育不断扩大，书刊增多等）不断的壮大，同时东正教开始进入俄罗斯的政治生活中。

无论是叶利钦还是普京，都是在苏联社会主义体制下培养出来的新一代领导人，接受的也是唯物主义理论，可是，为什么随着苏联政权的消失，他们很快的抛弃了共产主义理论，转而成为虔诚的东正教徒，又成为东正教会复兴的有利的推动者呢？原因在于：一、企图利用东正教在历史上服务政权的积极作用。现今俄罗斯两代领导人都从历史的经验中认识到，东正教不仅是国家维护统治最好的思想工具，同时在国家危难时机起到拯救国家的积极作用。无论是面临强大的敌人拿破仑的征服，还是德国希特勒的侵犯，东正教会都会发扬爱国主义的传统，号召教徒和子孙拿起武器，保卫国家，把侵略者赶出家园。在这种号召下形成强大的凝聚力，是任何事物都不能代替的。而如今苏联解体之后新俄罗斯再次处于危机时刻，国弱民衰，以失去苏联昔日的强大，各种政治派别争权夺利，经济不景气，社会不安定，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总体形式不是很乐观，人民把希望寄托在教会上，希望利用它的传统影响力，重新团结民族、团结俄罗斯人民，使俄罗斯走

出低谷，为国家的再度复兴发挥积极的影响力。二、人民在信仰和道德上出现危机。苏联的解体，放弃了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人民信仰的70多年的精神价值被完全的否定了。人们面临这种境况感到失落、空虚和无奈。于是，人民宁愿选择相信上帝，而俄领导人也借此利用东正教思想来填补这种精神的空地，况且东正教在俄国的历史上已有1000多年，在人民的心目中的影响早已扎根，统治者可以利用东正教爱国、道德及仁慈的传统来扭转现今俄罗斯社会的不良的（杀人、犯罪、酗酒、吸毒及卖淫等）现象，用东正教的教义来拯救人民的灵魂。三、人民渴望和平的心愿强大。苏联解体之后，各政治派别只顾争权夺利，政治家们许诺太多，兑现太少。而俄罗斯社会总体还是动荡不安，人们已经厌倦了不安定的生活环境，渴望和平的呼声越来越高。这呼声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2、对俄罗斯政治的影响

俄当局的宗教政策给东正教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时机，东正教会充分利用这种机遇，不断的拓展自己的势力，不断发展教会的事业，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这已经成为现如今俄罗斯社会发展中的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在社会生活中也发挥重要的作用。

其一，教会积极“参政议政”，在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由于新宗教政策的出台，1993年和1995年教会领袖阿列克西二世当选议会议员。早在1989年东正教大牧首阿克西二世就公开说过：“没有基督教成员的参与，我们社会的复兴是不可能的。”^①1991年和1996年的两届总统选举中，教会号召教徒支持叶利钦竞选，鼎力助叶利钦获胜和连任，真是“投桃报李”。更典型的是1994年9月叶利钦总统和议会斗争时，俄罗斯东正教会牧首出来充当调解人，积极斡旋，以缓和两派的政治矛盾。虽然最终没有调解成功，但是足以说明东正教会在俄国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普京总统任职后，东正教会主动配合当局的政策。“2000年5月，普京下令全国设立联邦区，改组政府各职能机构，以强化中央的垂直领导。东正教会立即发表声明，表示赞同普京总统的措施。在对外政策方面，教会也始终与政府保持一致立场，协助当局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它强烈反对北约东扩，谴责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的军事打击。1999年4月，阿列克西二世还亲自率领俄东正教代表团前往贝尔格莱德，执行寻求解决南斯拉夫冲突途径的和平使命。总之，在内外事务中，教会极力显示和发挥自己的政治作用。”^②

其二，教会自身势力的扩大。教会不满足永远成为国家“御用部门”^③的角色，因而极力寻求独立自主发展途径，不希望再依附任何派别。可见，教会的野心不小，企图摆脱对政局的依赖，妄图与国家政权在政治上达到平等，甚至可能超过它的力量。于是教会积极开展各种宗教活动，吸引广大的群众走进教堂，使东正教思想成为人们的精神支柱。据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提供的一份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全国有56%的国民信奉东正教，3%的国民信仰基督教其他派别，5%的国民为穆斯林，1%的国民信仰其他宗教。此外，约有31%的国民申明自己为无神论者，其余4%的国民宗教态度尚不明朗^④。在当代俄罗

^①王小路：《俄罗斯东正教复兴现象》，《东欧中亚研究》，1996年第6期，第51页。

^②姜莉：《东正教在俄罗斯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及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9期，第50—51页。

^③姜莉：《东正教在俄罗斯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及影响》，第48页。

^④《俄罗斯国民对待宗教的态度》[N]：《俄新社新闻》2000年8月25日。

斯的诸多宗教派别中，东正教不论在规模上，还是在社会影响上，都属于全国第一大宗教。它由 128 个主教区组成，共管辖 1.9 万个教区和 480 所修道院。东正教会还建立了完备的神学教育体系，它拥有神学院 5 所，附属神职中学 26 所，教区神职中学 29 所^①。此外，东正教会积极开展社会活动，关心社会福利事业，同时发展宗教的教育事业，大力宣传宗教思想，极力占领思想领域阵地。甚至东正教还走进了军队等强力部门，在加强对军人爱国教育的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并已确立其在军队中的特殊地位。“1994 年 3 月，俄罗斯国防部长格拉乔夫与东正教全俄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格拉乔夫正式宣布，俄军将与东正教会携手合作，共同致力对军人的精神道德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以及对军人的社会保护工作。至此，俄东正教会获得了合法的军人教育者和指导者的地位，堂而皇之地进入俄罗斯军队。”^②“目前，在俄军队中多设有宗教事务处；教会向其发放了 300 万册《圣经》，几乎人手一册；军人参与宗教活动者达 30% 以上；各部队中投入使用和正在建设的东正教堂和礼拜堂有近百所。”^③

总之，若审析东正教会复兴给俄罗斯国家带来影响时，我们应该像看硬币一样，要知道它有正反面。在肯定它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会发现东正教在通过各种途径壮大自身的实力，东正教羽翼日益丰满，在现今俄罗斯的地位也在不断的提高。虽然它在发展中仍面临诸多的挑战，但从长远来看，东正教会自身力量的增长则不能不引起俄罗斯当局的重视和深思。

^① 《当代俄罗斯东正教》，(<http://www.russian-orthodox-church.org.ru>: 81/todayru.hcm.)。

^② 林风：《东正教回归俄罗斯军队》，《国际展望》，1994 年第 8 期，第 23 页。

^③ 姜莉：《东正教在俄罗斯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及影响》，第 52 页。

结 语

东正教自传入俄罗斯已有 1000 多年的历史,在这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它一直与俄罗斯国家、俄罗斯民族、俄罗斯民族文化和民族思想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可以说“俄罗斯与东正教——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母亲!”^①。东正教对俄罗斯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纵观东正教在俄罗斯的历史,从政教关系的角度来看,其中苏维埃时期是东正教有史以来经历最艰难、最特殊的时期。因为世界上第一次出现了宗教与无神论的无产阶级国家政权之间的新型关系,这种新型的政教关系的出现使东正教从以往历史时期的天堂掉落到地狱,这种命运的改变正是记载了东正教及其教会遭受苏联政府几乎恐怖镇压的艰辛历程。

在苏联 70 多年的历史中,东正教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其中斯大林时期苏联政教关系的变化恰好是苏联整个时期的一个缩影。这个时期的政教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东正教在卫国战争前一直处于被打击、被镇压的状态,东正教的命运面临着历史的严峻考验,但是东正教以它坚强的生命力,延喘声息的生存下来。第二,卫国战争时期,斯大林面临国内外环境的影响,被迫结束运用行政手段打击东正教的政策,开始转为支持和利用东正教的政策。东正教会号召人民保卫国家,与侵略者斗争到底,东正教会的爱国主义活动得到苏联政府的肯定,于是这时期的政教关系转为正常化。当然在这个宽松的宗教政策时期,东正教会抓住有利的机遇,开始恢复和发展自己的宗教势力。第三,战后斯大林没有改变战时的宗教政策,因为斯大林在战时已经认识到东正教自身拥有巨大的财富,这个财富对苏联政府有着巨大的利用价值,即可以帮助他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也可以号召人民全力加入社会主义建设中;同时苏联的外交方面也需要东正教会发挥作用。况且在意识形态的微小的让步,可以换来极其有利的好处。因而斯大林继续战时的宗教政策,于是宗教出现了短暂的繁荣时期。由此可见,斯大林时期苏联政教关系无论怎么变化,都是以维护国家政权的利益为前提,以利用教会的价值为国家发展服务为基础,国家政权掌握着双方关系变化的主动权,东正教与教会永远只能是被动的接受,东正教与教会只有主动的配合国家政权的政策,它才有可能有机会恢复和发展自己的力量,否则就会面临被消灭的命运。当然国家领导人不能脱离本国的国情,主观随意的制定国家方针路线,否则只能导致国家的衰退甚至这个国家的政权退出历史的舞台。

本文通过斯大林时期苏联政教关系的论述,从哲学的观点来看政教双方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即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对立体现在二者的思想信仰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不同,统一体现在二者都极力维护俄罗斯国家的统一,这种关系就决定政教关系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此外,纵观斯大林时期苏联政教关系的历史,我们可以从中得到

^①韩全会:《浅谈俄苏时期的政教关系》,第 56 页。

以下处理政教关系的启示：

第一，要客观、公正、全面、科学地看待宗教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坚持历史的唯物主义观，决不能主观随意、片面武断的对待宗教。苏联的领导人就是由于在主观上片面的、教条的、简单的理解宗教的性质，导致在政教关系方面犯了严重的错误，从而为社会的不稳定埋下祸根。第二，国家对宗教问题处理不能采取行政命令的手段。如果过分的采取过激的手段即扶植或压制，不是解决政教关系问题的根本措施。因为国家一旦超越了自己的权力干涉宗教组织，不但达不到目的反而适得其反。譬如：斯大林时期的宗教政策过去长期奉行对宗教的压制政策，希望尽快消灭宗教，结果教会却更加坚强的生存下来。这个现象好像很有讽刺意义，但却是不争的事实。第三，政教关系的实质应该是政治上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而不是针锋相对。在政教关系这一对矛盾中，一个追求的是世俗权威，一个掌握着精神权威，双方如果合作，是一种互补关系，如果对立，则会两败俱伤。因此，任何一方想把对方变成自己统治的工具，都是对这种关系实质性的误解；宗教如果与国家政权分离，走自己的改革发展道路，支持和拥护政府的政策，且能做到宗教的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相结合，那么它必定会得到更多人的爱戴和政府的支持，当然政府不能用行政命令的手段迫害宗教，否则适得其反。苏联时期大多数领导人对政教关系处理的失误的历史，已经证明政教关系处理的失误激化了国家民族的矛盾，成为促使苏联解体的一个因素。第四，国家应该完善立法，制定相关的法律保证宗教的合法地位，真正实现政教分离，这样我们才能利用宗教立法把国家的宗教政策法律化、条文化，用法律规范宗教行为、保护合法宗教、抵制非法宗教活动、打击宗教犯罪，规范政府宗教部门的行政行为。美国法学家伯尔曼说：“没有法律的宗教，则会丧失其社会有效性。”^①可见，宗教的法律不完善，则会导致公民没有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也为恐怖分子利用宗教提供了可乘之机。尤其是当今恐怖主义分子频频利用宗教作为幌子进行恐怖主义活动的情况下，加强宗教立法，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合法行使，是打击宗教恐怖主义的必然要求。因而这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制定宗教政策刻不容缓的问题。第五，宗教自身也应该不断的调整完善政策，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因为世间的万物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否则就会被淘汰。除此之外宗教不能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发生冲突，否则就是自取灭亡。第六，任何国家在制定国家政策时，都必须追寻实事求是的路线，结合本国的国情，不能急于求成，超越实际的主观的制定国家建设方针路线。苏联从斯大林时代开始直到勃列日涅夫时代都是急于建成社会主义国家，过分的强调无神论的教育和宣传，企望在向发达的共产主义过渡时出现奇迹。于是，在宗教方面理论指导出现了严重的错误。由于苏联领导人没有认清本国的国情，僵化的、教条的应用马列主义原理，使苏联在这时代的政策脱离了正确的轨迹，从而加速了苏联的解体。因此，国家要想发展、要想繁荣，就必须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

所以，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借鉴苏联宗教政策的经验，对世界各国来说也是有着积极的意义，尤其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拥有多种信仰更应该重视宗教政策的制定，这种政教关系处理的好坏直接影响国家的统一问题。

^①[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第25页。

参考文献

俄文资料:

- [1] *Бабкин М.А.* приходское духовенство Россий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и свержение монархии в 1917 году[G].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я, 2003 (6) .
- [2] *Шкфровский М.В.*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при Сталине и Хрущев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церков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СССР в 1939—1964 годах) .М.Крутицкое Патриаршее Подровье общество любителей церковной истории 1999. 400с.[G].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я.2002 (10), 162—165.
- [3] *Шкфровский М.В.*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1958—1964 годах[G].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я, 1999 (2) . 42—58.
- [4] *Шкфровский М.В.*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1943—1957 годах[G].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я, 1995 (8) . 36—56.
- [5] *Круглый стол .Роль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в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G].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я, 1990 (3) . 84—106.
- [6] *Васильева О.Ю.*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1927—1943 годах[G].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я, 1994 (4) . 35—46.
- [7] *Поспеловский Д.В.*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хх веке[G].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я, 1999 (4) . 161—163.
- [8] *Шмелев Г.М.*—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её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и экономика до и после 1917 года[G].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я, 2003 (11) . 36—51.
- [9] *Дмитиев М.В. , Д.В.После Ловский*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хх веке[G].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я, 1999 (4—5) .
- [10] *Румяцев А.Б, Лесков Н.С.*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J].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95 (1) .
- [11] *Любосудров А.М.* О православии и церковности в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J].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96 (2) .
- [12] *Священник Сергей горбун.* Ро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период с 1943 по 1970 год [J]. Журнал Московской патриархиц, 1993 (1) .
- [13] *Стесранович П.С.* Боярство и церковь в домонгольской Руси[J].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я, 2002 (7) .

俄文论著:

- [14] *Алов А.А., Влбимиров Н.Г., Овсинко Ф.Г.* Мировые Религия[M]. Москва, 1998.
- [15] *Д.В.Поспеловский.*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Истории РУСИ РОССИИ И СССР.[M]. Москва, 1996.
- [16] *Эрин Г.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Религия[M]. Москва, 1974.
- [17] *Лсавцев.Э.И.* Критика Ђуржуазной фальсификации положения религии в СССР[M]. Москва, 1975.
- [18] *Голубиский.Е.Е.*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церкви[M]. Москва, 1991.
- [19]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ссср сибир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 и церковь в России, феодальног о периода (мапериясы), Новосибирск[M]. Москва, 1989.
- [20] *Федоск Б.А.* Церковь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Минск. наука и техника.[M]. Москва, 1988 г .
- [21] Религия и церковь в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совесткие историки о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в России)

[M].Москва, 1975.

[22] *Булгаков С.Н.* Православие: Очерки учение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M]. Москва, 1991.

[23] *Руиский С.М.* Церковная реформа 60—70 годов XIX века [M].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1995.

[24] *Андрей. Наместников.* Трагедия русского православия [M].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 1998.

[25] *Каршиев А.В.*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церкви, [M]. Москва, 1991.

[26] *Антонова О.А.* Искусство и православие [M]. Московский рабочий, 1983.

[27] *Белов О. А.* Русское православие: веки истории [M].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а, 1989.

[28] *Куроедов В.А.* Религия и церковь в советско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 [M]. Москва, 1981.

[29] *Клибанов А.И.* Русское православие [M].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на, 1989.

[30] Комплексная программа духовно—нравственного воспитания детей и молодёжи на уровне района (муниципального центра) [M]. Москва, 2003.

[31] *Дунаев М.М.* Православие и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I—II) [M]. Москва, 2001.

中文论著:

[1] [苏]波克罗斯基著. 俄国历史概要 (上下册) [M]. 三联书店, 1978.

[2] [俄]С. Н. 布尔加科夫著. 东正教——教会学说概要 [M]. 徐风林译. 商务印书馆, 2000.

[3] 曹维安著. 俄国史新论 [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4] 戴桂菊著. 俄国东正教会改革 (1861—1917) [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5] [俄]弗兰克著. 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 [M]. 徐风林译. 学林出版社, 1998.

[6] 傅树政, 雷丽平著. 俄国东正教会与国家 (1917—1945)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7] [俄]赫克著. 俄国革命前后的宗教 [M]. 高骅, 杨缤译. 上海学林出版社, 1999.

[8] [俄]В. О. 克柳切夫斯基著. 俄国各阶层史 [M]. 徐昌翰译. 商务印书馆, 1994.

[9] [美]拉伊夫著. 独裁下的嬗变与危机——俄罗斯帝国二百年剖析 [M]. 学林出版社, 1996.

[10] 马德邻著. 宗教, 一种文化现象 [M].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

[11] [俄]В. В. 马夫罗金著. 俄罗斯统一国家的形成 [M]. 余大均译. 商务印书馆, 1994.

[12] [俄]尼·别尔嘉耶夫著. 俄罗斯思想 [M]. 雷永生, 邱守娟译. 三联书店, 1995.

[13] [俄]尼·别尔嘉耶夫著. 俄罗斯思想的宗教阐释 [M]. 邱运华, 吴学金译. 东方出版社, 1998.

[14] [英]尼尼安·斯马特著. 世界宗教 [M]. 高师宁, 金泽, 朱明忠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15] [苏]诺索夫主编. 苏联简史 [M]. 三联出版社, 1977.

[16] 赵匡为主编. 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政教关系 [M]. 宗教出版社, 1988.

[17] [俄]索洛维约夫著. 神权政治的历史和未来 [M]. 钱一鹏, 高薇, 尹永波译. 华夏出版社, 2001.

[18] [苏]苏联科学院古贝尔, 北京编译社. 世界通史 (第三卷) [M]. 三联出版社, 1961.

[19] [苏]苏联科学院主编. 世界通史 [M]. 北京编译社, 1975.

[20] 沈志华主编.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第2卷) [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2002.

[21] 沈志华主编.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第16卷) [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2002.

[22] [美]汤普逊著. 理解俄国: 俄国文化中的圣愚 [M]. 杨德友译. 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8.

[23] 王宇博等著. 骁勇俄国人 [M].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1.

[24] [苏]约·阿·克雷维列夫著. 宗教史 (上下卷) [M]. 王先睿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25] 张百春著. 俄罗斯东正教神学 [M]. 上海三联书店, 2000.

[26] 张达明著. 俄罗斯东正教与文化 [M].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9.

[27]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民族与宗教研究中心著. 世界宗教问题大聚焦 [M]. 时事出版社, 2003.

[28]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译. 苏联宗教政策 [M].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0.

[29]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民族与宗教研究中心著. 周边地区民族宗教问题透视 [M]. 时事出版社, 2002.

[30]赵匡为主编. 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政教关系[M]. 宗教出版社, 1988.

[31][俄]M. P. 泽齐娜、Л. B. 科什曼、B. C. 舒利金著. 俄罗斯文化史[M]. 刘文飞, 苏玲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

中文论文:

[1]阿·维·罗曼诺夫著. 俄罗斯学者关注<东正教史>[J]. 戴桂菊译: 世界宗教文化, 2000 (3): 56—59.

[2]戴桂菊. 俄罗斯东正教探源[J]. 世界宗教研究, 1998 (4): 95—100.

[3]戴桂菊. 东正教与俄罗斯改革[J]. 东欧中亚研究, 2001 (2): 54—60.

[4]傅树政. 战后斯大林时期苏联宗教政策剖析[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95 (6): 52—57.

[5]傅树政, 雷丽平. 卫国战争时期苏联政教关系的正常化[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94 (2): 77—83.

[6]傅树政, 雷丽平. 东正教在今日俄罗斯[J]. 黑龙江社会科学, 1996 (3): 55—59.

[7]郝承敦, 赵为龙. 论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抗战合力中的传统文化[J]. 临沂师范学院学报, 2001 (4): 43—46.

[8]黄陵渝. 俄罗斯学者谈当代俄罗斯宗教与国家关系问题[J]. 世界宗教文化, 1996 (3): 64.

[9]韩全会. 浅谈俄苏时期的政教关系[J]. 俄罗斯研究, 2004 (3): 56—59.

[10]蒋莉. 东正教在俄罗斯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及影响[J]. 现代国际关系, 2002 (9): 48—53.

[11]乐峰. 简论东正教的特点[J]. 世界宗教研究, 1997 (3): 103—113.

[12]乐峰. 俄罗斯东正教现状[J]. 世界宗教文化, 1995 (4): 27—31.

[13]乐峰. 俄罗斯东正教现状(续)[J]. 世界宗教文化, 1996 (3): 22—27.

[14]A. 罗曼诺夫, 乐峰译. 俄罗斯东正教与现代化[J]. 世界宗教研究, 1996 (3): 57—67.

[15]李小桃. 东正教与俄罗斯文化[J]. 渝州大学学报, 2002 (2): 77—79.

[16]雷永生. 宗教沃土上的民族精神—东正教与俄罗斯精神之关系探略[J].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1998 (1): 49—57.

[17]任光宣. 东正教在今日俄罗斯[J]. 俄罗斯文艺, 1996 (3): 55—57.

[18]沈影. 析当今俄罗斯东正教的复兴现象[D]. [硕士学位论文].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 2004.

[19]王春永. 俄罗斯政治中的宗教因素[J]. 俄罗斯研究, 1999 (3): 11—14.

[20]王利亚. 宗教在俄罗斯军队中复兴的原因初探[J]. 军队政工理论研究, 1995 (2): 79—80.

[21]王树春. 俄罗斯的传统安全观与东正教的救世观[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2003 (1): 54—61.

[22]王小路. 俄罗斯东正教复兴现象[J]. 东欧中亚研究, 1996 (6): 49—54.

[23]王春永. 浅析东正教对俄罗斯社会的作用和影响[J]. 现代国际关系, 1999 (7): 25—27.

[24]徐方治. 原苏联在宗教问题上的一些重大错误[J]. 东欧中亚研究, 1995 (4): 54—58.

[25]杨翠红. 试论东正教的罗斯化[J]. 史学集刊 2004 (1): 97—102.

[26]杨翠红. 俄罗斯东正教会与国家政权关系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004.

[27]苑一博. 中国学界的东正教的研究[J]. 世界宗教研究, 1994 (3): 139—144.

后 记

时光如水，岁月如梭。两年的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我将永远怀念在东师求学的每一个日夜！因为在这里我度过了自己最为充实的两年时光，这将成为我人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这里有宁静雅致的林中小径，有明窗净几的教室，有汗牛充栋整整齐齐的图书，还有许许多多学识渊博受人景仰的专家学者。我庆幸自己能够有机会在这里学习，还能够得到那么多优秀教师的教导和培养，正是在这些老师们的谆谆教诲之下，我经过一年多的忙碌，我终于完成了这篇迄今为止写过最长的论文。其中收获的喜悦总是大大多于付出的艰辛。然而本文不过是在广泛汲取众多研究成果的前提下所获得的一点粗浅的认识，和那些终身跋涉于学术研究领域的前辈和老师们相比，我这点辛苦与所得不过是沧海一粟。

不过在即将离开校园的时刻，在回首过去的时光中，我才发现充斥我心头的仍是满满的感谢！我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董小川教授。两年来，老师用那慈父般的心默默关心着我们这些学生，同时在学业上循循善诱，谆谆告诫，让我们领略到老师的治学风范，令我终生难忘。其次，我要感谢北京师范大学的哲学系的张百春教授，在收集材料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最后在学习过程中，我还有幸得到了梁茂信教授、于群教授、李晔教授、孙群郎教授以及高嵩副教授，他们对我的论文提出宝贵的意见。在此，我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自己学识浅陋，能力有限，论文之中的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实不足以拿出手来作为敬献给诸位师长们的礼物，因此很惭愧。不过在以后的工作学习过程中，我将继续努力，奋发向上，以取得优异的成绩来回馈诸位师长们多年来的教育和培养！
努力，奋发向上，以取得优异的成绩来回馈诸位师长们多年来的教育和培养！

2006年5月